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6年第13期
总第(383)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6年7月15日

目 录

城市与大学互动关系探讨	
——以纽约市与其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为例.....	郟海霞 陈 超 (02)
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四种联动行为模式.....	甘永涛 唐琼一 (08)
美国大学与城市在房地产开发上的冲突与合作.....	饶燕婷 (12)
英国大学与城市协同发展的案例分析	
——以伦敦大学与伦敦市互动为例.....	沈 忱 郟海霞 (16)
英国城市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	
——基于利物浦大学的个案分析.....	茹 宁 (19)
从历史视角探析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张臻汉 张海英 张彦通 (24)
日本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分析	
——以名古屋大学与名古屋市为例.....	于 颖 (30)

8 e]œ,°B+U•f , •#Q rĐ]œ =(#[]œ = ‡›]œ = *U]œ1•
c L4à]œ 8³ C , Cé A÷ D]œ D 8,°\$@ \$Æ >7 á í U]œ G/t P P μ ¶ e Â. Aü =
p u Ò G L Ñ l i ð B C x , μ]œ-* Û p/t P C x > æ, U , .J0- Á]œ ^. Aü+U Ý =
¶ e M Ÿ æ Â F Ò E ç L1• i M ~ [-v) (" + ^ , P P Q æ Á 8 0 A ô >]œ D 8,° © 31 P
f 0° L* =/t P C z \$Æ = <-\$ =,° C 68*6B Ý+U. -4 , • P W f >' = ð f / ± 6 B ... B
< >]œ D 8 ... B < Ê B F p Q 1• • 6 è,° .J0-N¼ • 6 , • Ê B ' p]œ <,° 1 Cé & i >
p!š , b @]œ D 8 È P © 31 .J0- p F ? N Î , L ü c F ? 5 L 9 ~ ½ 1 , O B 16; >

主 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范笑仙 责任编辑：聂文静 李 璐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 编：100082 电 话：(010) 59893297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 址：www.hie.edu.cn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观点栏目)

城市与大学互动关系探讨

——以纽约市与其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为例

郝海霞 陈超

纽约是世界著名的经济、金融城市，被誉为全球金融中心、传媒中心、时尚中心、医疗保健中心和贸易中心。同时它也是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分布在纽约市内的大学有20多所，著名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任塞列尔理工学院、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等。2002年1月迈克尔·布隆伯格就任纽约市第108任市长以后，根据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人口持续膨胀、基础设施老化、高科技竞争力偏弱、气候变化、经济衰退、生活质量下降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提出了科技城市、绿色城市等新的定位。并且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推动科技园建设、加速大学的技术转让、加速发展滨水地带等改革措施，大力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和城市、产业的合作，为纽约的复兴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纽约的城市定位及其对大学的需求

(一) 打造高科技城市

纽约新的城市定位首先是高科技城市。美国的高科技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主要集中在硅谷和波士顿，而纽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希望打造自己的高技术产业，并且一度迎来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与西部的“硅谷”遥相呼应而被誉为东部的“硅路”。然而，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纽约“创新之都”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布隆伯格就任市长后，重新宣布要将这座金融城市打造成“创新之都”和“东部的硅谷”。为了实现“创新梦”，纽约市于2010年底正式启动了罗斯福岛上的科技园建设项目。2011年12月19日，康奈尔大学及其合作伙伴以色列理工学院在纽约市举办的设计竞赛中获胜，将在罗斯福岛上建造一座价值20亿美元的应用科技园区。该园区占地约195亩，纽约市政府为项目投资1亿美元用于改造基础设施。园区项目包括纽约最大的太阳能电池阵列、四亩地热井、50万平方英尺的公众开放绿地和15万平方英尺的主

教学楼。一期建设将于2014年正式开工，2017年完结。该科技园将为创业公司提供孵化器和经营空间，并为在纽约创办3年的公司提供1.5亿美元的起步资金。此外，科技园将于2012年9月开始招生，第一批课程将在纽约市的其他临时地点进行教学。

(二) 建设绿色城市

纽约的另一个城市定位是绿色城市。在布隆伯格的领导下，纽约市于2007年颁布了《纽约市总体规划》（下称《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更绿色更强大的纽约”，从而将纽约市今后的发展定位为“绿色城市”。这个目标在强调纽约的经济和金融功能的同时，更加强调纽约的宜居功能和吸纳功能，尤其是对高技术专业人才的吸纳能力。正如纽约市规划局局长和规划委员会主席阿曼达阿·M·布顿所说的那样：“纽约是一个世界性的资本和文化中心，我们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以维护它在本地区、全国和世界上的经济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努力创建一个更加包容的城市，在这里每个人都有经济方面的机会，有更多可以提供的住房，有支撑我们的健康环境，以及不断改善的生活质量”。为达到“吸引和留住创造性人才”的最终目的，纽约市规划局联合其他24个城市公共机构，积极组织实施《规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过去四年里，在改善现有公园的基础上，纽约市又新建了几百英亩的公共场地；创建或保护了64000个住房单元；为纽约人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案；在使现有建筑更加节能方面颁布了最雄心勃勃的法律，气体排放标准比2005年的水平下降了13%。在《规划》提出的127项方案中，有97%的方案在颁布一年后得到实施，并且有2/3的方案在2009年获得或者大部分获得了标志性的进展。最新版本的《规划》提出，到2013年12月31日，要完成132项方案和400多个具体的标志性成果。纽约正在成为一个绿色、环保和宜居的城市。

（三）新的城市定位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随着纽约从传统的消费城市、金融城市向高科技城市和绿色城市转变，它对大学的需求也随之发生改变。新的需求主要包括：（1）要求大学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的、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高度衔接的专业，尤其是社会需求量大、代表社会经济转型方向、以服务为导向的专业。例如，从就业机会看，2008年至2009年间，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岗位增加了32600个，休闲娱乐、医疗、餐饮和其他服务性岗位增加了7700个，政府提供的岗位则增加了1500个。相反，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减少了48100个岗位，制造业减少了34900个岗位，建筑行业减少了24000个岗位，财政金融业减少了24300个岗位，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减少了22500个岗位，信息业减少了4900个岗位，自然资源和采矿业减少了100个岗位。大学的专业设置必须适应和满足上述变化。（2）要求大学提供更多的专门人才。建设高科技城市和绿色环保城市离不开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既包括领导型、创业型、开拓型、研发型的人才，如公司老总、企业高管、金融领袖、专利持有人和发明人、科学家等，又包括经营型、管理型、实干型、服务型的人才，如网络工程师、城市规划设计师、信息顾问、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牙医、医护人员、测量员、会计、速记员等。尽管纽约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在不断增强，但它认为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缺口仍然很大，纽约州和纽约市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在专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3）要求大学创造更多的智力成果，并加速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建设高科技城市和绿色城市需要大量科技成果的支撑，而这些成果主要依赖于纽约的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州立大学系统和私立精英大学系统。

二、纽约与其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一）在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合作与互动

为了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根据州教育专员和高等教育顾问委员会的建议，纽约州从1999年开始确立了高等教育的优先事务，其中之一就是“在尊重不同学校的使命和自治，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责任要求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学习和发展的质量”，并且

指出，“对于高等教育来说，为了服务于纽约州人民以及获得公众、工商业界和政治领袖的继续支持，有必要建立更高的学习标准”。为此，纽约州教育局高等教育办公室和州大学董事会发起了质量保障动议，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全州高等教育系统的本科教育质量尤其是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进行评估，并对评估活动进行监督。此外，高等教育顾问委员会的建议符合州大学董事会的政策，州教育专员对此展开了特别行动，任命了一个由两名大学校长担任联合组长的外部特别小组，为州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中的角色提供一般指南。1999年8月，特别小组向高等教育办公室提交了报告。根据报告，经与质量保证顾问小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的主要执行官员磋商，州教育局高等教育办公室于1999年秋季发起了质量保证动议，以获得更加具体的行动建议。2000年9月，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董事会委员会接受了四项建议：（1）提高学生的学习和发展；（2）为消费者改善信息；（3）为政策制定者改善信息；（4）减少对学院和大学不必要的重复责任要求。第一项建议要求所有授予学位的学院和大学对其教育效果进行持续和系统的评估，并利用评估结果去改善其质量和效果。

为了确保高等教育质量，纽约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四类高等教育系统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州大学董事会的方案是：建立和完善认证制度；建立新世纪电子图书馆；发起核心高等教育学术资料收集计划（CACHE）；提供数字电视；探索好的远程教育实践；增加全职教师的数量等。纽约城市大学系统（CUNY）的方案是：为社区学院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全职教师；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师以学习美国历史；加强对教师教育项目的认证；确保70%的课程由全职教师来承担；采用绩效管理方法进行全方面监控；实施纽约城市大学水平考试（CPE）等。非盈利性私立学院和大学系统的方案是：强调私立学院和大学的内在力量和独特使命；将师生比维持在1:12的平均水平；继续实施校内评估等。盈利性私立学院系统的方案是：广泛采用各种手段去满足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包括学术项目评价、机构评估、规划等；发起更多的行动方案，如安排实习、提供更加广泛的学生服务、创建在线服务、为有进取心的学生提供建议等。纽约州立大

学系统（SUNY）的方案是：继续实施使命评估，确保整个系统的学术质量维持最高水平；鼓励不同校区战略性地思考各自在SUNY系统、纽约州以及全国的角色；增强各个校区的个性和差异；提高各个校区在地区和全国同行中的声誉；支持跨校区合作；确定目标和基准以监控成功；开发新的项目，修订现有的项目和淘汰过时的项目，并维持每个校区学术使命的特色；每个校区都和SUNY系统管理部门共同开发一份更新后的《谅解备忘录》，确定各个学院如何具体实施SUNY在总体规划中描述的诸多要素，并确定绩效目标；实施学生学习结果评价；继续扩大全国性认可的项目；更新各个校区的课程以适应变化着的人口统计特征；探索新的和/或扩展已有项目，使用以技术为媒介的学习方式；改善技术基础和设备；调整管理结构和增加资源等。

这些方案分别从制度保障、物质保障、师资保障、使命要求等方面来保障纽约的各类高等教育质量，并对学术项目、评估机构、评估结果、评估工作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方案中的行动计划和措施均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核心，确保为纽约提供优质、高效的高等教育，不断满足全市、全州乃至全国对各类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

（二）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与互动

对于比较成熟的城市而言，专业人才往往是社会的中坚和就业主体。纽约州和纽约市一直重视对职业性的专业学位进行鉴别、认证和授权，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州职业分类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这两个体系是维护纽约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保障充分就业的基石。例如，2004年共有40个专业的674468名专业人员获得了州大学董事会和州教育局的许可，比1997年增加了12.3%。这些获得州许可的专业包括设计、建筑、陆地测量、健康、牙医、营养学、医学、会计、速记、临床医学、临床技师、心理健康咨询、婚姻和家庭咨询、心理分析等。2004年，布隆伯格签署法令，又有3个专业获得州许可，它们是临床实验专家、细胞学技师和临床实验技师，这些专业也将获得州大学董事会和州教育局的许可。根据州劳工处的统计，2002年至2012年间有6个从业人员增长最快并且开业数量最多的专业，它们是药剂师、兽医、内科医师、物理治疗师、牙医、心理健康和预防药物滥用社会工作者。

目前，纽约在很多专业领域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州大学董事会和州教育局开始认识到各个专业领域的人才缺口问题，并将会继续监督所有得到许可的专业的供给、需求和变化情况，并和高等教育机构间形成合作。这种合作不仅限于短期的二年制学院，还包括与诸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的合作。

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州大学董事会和州教育局的方案是：（1）增加实践供给。包括增加护理方面的机会、增加专业教育机会、维护职业资格领域人口的文化多样性、招聘图书管理员、建立护理学院等。（2）强调持续的专业能力。包括继续实施专业教育，使每个专业人员具备与提供的服务相应的胜任力。纽约城市大学系统的方案是：（1）专业研究学院继续反馈纽约地区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的需求。（2）开设新的课程（如新闻学研究院将开设教育领导方面的课程）以满足劳动力需求和当前的职业挑战。（3）如果资源许可，计划在其总体规划中增加护理课程的容纳能力。（4）和其他机构密切合作，一起协调大学范围内有关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专门人才培养。非盈利性私立学院和大学的反馈信息是：（1）通过满足目前的劳动力需求，继续在纽约的经济和全球竞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继续培养能够适应最先进的技术、能够学习新的工作技能、并且能够在高度竞争的工作场所中解决问题的人才。（2）继续培养知晓和精通所在职业的全球领域的知识、并能进行国际交流的人才。（3）继续对护理、医药、图书馆学和其他专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做出反应，开设药物科学、药物管理、生物医学技术、临床实验管理等方面的新课程和“医学—法律”联合课程。（4）支持建立护理学院以增加学历护士的数量。除法庭报道和会计学外，很少有私立学院提供可获得职业资格授权的课程。纽约私立学院将为此做出不懈努力。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方案是：（1）继续开发对纽约的未来有重要意义的课程，如材料科学和材料工程、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法医生物学、护理学、网络安全等领域。同时将尝试引入40种具有职业授权资格的新课程，包括护理、口腔卫生学、工程学、社会工作和会计学等。（2）在与州需求一致的领域，将更加关注毕业生的多样性。（3）

配合社区学院的战略规划目标，确保对全州需求做出积极响应，并持续关注扩大全州护士的培训机会。

（三）在研发方面的合作与互动

知识生产、技术转让与政策咨询是各级政府与高校合作的主要渠道，纽约州和纽约市在这方面也走在了其他州和城市的前面。例如，1999年，纽约州的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获得许可收入12.37亿美元，在全美各州排名第一；获得633项可以产生收入的许可证，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1148）；获得261项美国专利，排名第三，前两位是加利福尼亚州（448）和马萨诸塞州（300）；申报了474项美国专利，排名第四，前三位是加利福尼亚州（1225）、马萨诸塞州（629）和宾西法尼亚州（568）；新成立了17家公司，排名第四，前三位是加利福尼亚州（45）、马萨诸塞州（31）和宾西法尼亚州（18）；获得了15.8亿美元与技术转让相关的研究经费，排名第三，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27.4）和马萨诸塞州（16.2）。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8年的统计，2006年纽约高等教育机构用于研发（R&D）的经费为38亿美元，占全美高校研发经费的7.9%，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65亿美元，13.6%）。这一数字在2006-2007学年占到全美100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研发经费的10%。自布隆伯格就任纽约市市长后，从政策、资金等各个方面大力鼓励专利申请和技术转让，并通过创建应用性科技园等为成果孵化、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提供平台。

为了推动成果的研发和转让，州大学董事会要求各大学系统积极探索和发现与纽约州发展相关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包括能够满足纽约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有关政策。州教育局召集生产者、消费者和研究项目的资助者共同确定研究需要并公开其结果。纽约城市大学系统的应对方案是：（1）继续改善整个城市大学系统的研究活动和研究品质。包括：通过维持和改善校园的研究设施和研究机会培育有利于研究的环境；计划设立高级科学研究中心，系统内任何校区的教师都可以利用中心的设备从事科研；对城市环境展开跨学科研究。（2）为博士后人员提供更大的制度性支持。（3）全面削减博士生学费，以增强该系统在吸引优秀生源方面

的竞争力。（4）扩大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领域。（5）继续扩大结构生物学和光电子学的范围（扩大为生物光子学和纳米科学）。该系统的应用光子学高级技术中心（CAT）将和产业界、大学、其他机构一起推进其科学和经济目标，进一步服务于纽约州的公司、企业。（6）进一步发挥和增强博士后的作用。随着博士后人员的持续增加，其学术存在应该被统一到研究这一使命当中。非盈利性私立学院和大学的方案是：（1）继续维持那些对纽约州和全国意义重大的前沿研究项目的卓越品质。（2）继续保持每年从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获得1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在NIH全国资助机构中保持前100的位置。（3）进一步实质性地扩大研究项目的强度和范围。（4）继续支持使用本科生作为科研助理和合作研究者的研究项目。

（5）继续通过期刊、会议和网络分享信息。（6）继续发挥博士后和研究人员的作用。（7）继续利用教师的专家意见并引介学术项目去满足城市发展需求，提升项目的质量和机构的效率，去建立、开发和增加纽约的公司，包括小型企业。（8）继续推动技术发展和技术转让，提升纽约的工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并将研究集中在有利于促进这种竞争取得成功的领域。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方案是：（1）将每年从外部获得的研究经费目标扩大到10亿美元以上。（2）通过布法罗分校的卓越生物信息技术中心、奥尔巴尼的纳米技术中心以及石溪分校无线通信中心的协同研究，启动或强化系统内的学术项目。在吸引商业合作和产生新的科研突破方面发挥孵化项目的催化剂作用，并为培训大气化学、纳米电子学、无线通信和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员提供重要的教育资源。

城市大学系统、州立大学系统以及私立学院和大学系统分别从不同层次在研发方面与纽约展开合作，其合作方案既提高了纽约市的知识和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全州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使纽约在全美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中保持了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高校在与纽约进行科研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大量科研经费，增加了高校的经济实力，还增强了大学的学术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此外，纽约还和大学在确保入学机会、增强高

等教育透明度、增加高等教育供给、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缩小学习差距、为残疾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大学预备教育、增加高等教育投资等方面开展着广泛的深度合作。有些合作很早就已经开始，并处于持续发展过程中；有些合作项目正在实施；有的则还在规划之中。无论哪方面的合作与互动，均体现了纽约的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一方面，纽约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纽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思考与建议

（一）城市的规划定位与大学的规划定位应相互策应

城市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则是城市的名片，二者相互依存，共融共生。大学所处的地理环境往往是成就一所卓越大学的基础性条件，从古至今，校园的选址都是大学缔造者们精心而审慎的工作之一；反过来，卓越的大学同样能够为城市带来资源和声誉，卓越大学往往成为资金、知识和人才的聚集地，那些国际性的大都市和令人向往的大城市往往与某所或者若干所声誉卓著的大学联系在一起，不仅是经济和金融中心，而且是科技和文化重镇。有没有卓越的大学已经成为判断一座城市的品位、吸附力、发展潜力、未来前景的重要标志。基于城市和大学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城市大学化和大学城市化正成为21世纪城市和大学发展的新趋势。然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和大学的规划发展还未紧密结合起来，人们对于二者的依存关系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城市管理当局来说，大学对于城市的作用似乎可有可无，由于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很难在短期内显现出来，他们甚至更热心于经济利益和短期成绩，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城市品牌建设和文化积累；对于大学尤其是部属和省属大学来说，服务于国家和部门的需要往往压倒了服务城市和社区的需要，他们更关注“宏大”的和“理所当然”的需要，而对于大学所赖以存在的城市 and 社区的“微观”和“现实”的需要关注不够。这种相互漠视和不同取向，造成了城市和大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疏远或脱离，甚至紧张和对立。城市和管理当局及行政部门

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应在推动二者的合作和互动方面有所作为。首先，要加强和完善顶层设计，通过国家主管部门、市政管理部门、大学行政部门、各级规划部门的密切合作，共同设计城市和大学的合作与互动蓝图，将城市的规划定位、发展计划、发展目标、现实需要等与大学的规划定位、发展计划、发展目标和现实需要衔接起来。其次，要对已经自下而上形成的合作和互动关系给予支持和引导，同时要创造条件去开发和培育新的合作和互动渠道。就现阶段而言，我国许多城市和大学的规划发展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和“自发”的状态，仅仅依靠城市和大学的“觉醒”和“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引导培育，都是必要和必须的。

（二）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应有一定的选择性

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有许多渠道，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互动要素，如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土地等。但并非每一种渠道和每一种要素都是合适的。任何城市和大学的发展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条件，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因此，大学和城市之间的合作应该有一定的选择性，应该基于现有的条件和要素，采取合适的渠道和途径，探索易于成功的合作和互动模式。从纽约和大学互动的成功经验来看，二者的合作和互动主要是围绕专门人才、科研成果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在专门人才方面，纽约目前有40多门获得州认可的专业课程，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和从业者，是纽约州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柱力量。从科研成果方面来看，通过创建应用性科技园，纽约和大学在科研成果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合力。从我国的实际来看，地区、城市和大学的差异非常明显，不同地区、城市和大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它们的合作和互动必须因地制宜，有选择地进行。例如，东部地区城市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可能主要是资金、资源、科研成果、技术、高端人才等方面的合作，而西部地区城市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可能更多的是专门人才、实用技术、政策咨询等方面的合作。具体到单个城市和单所大学，需要根据本地区和本城市的产业分化程度、行业分布情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大学的专业设置情

况、服务能力等确定合作渠道和合作要素。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一线城市，产业结构比较成熟、行业覆盖面广、社会成熟度高、高水平大学数量多、高等学校层次分明、剪务能力强，因而可以建立比较全面的合作和互动关系；而一些二、三线城市，则可以根据本地区的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以专门人才、应用技术为主展开合作和互动。就现阶段我国城市社会的发展现状看，普遍需要大量高素质专门人才，因此应普遍建立符合各自特点的专业课程。这类课程以应用型、技术型为主，与社会需求全面对接，根据社会需求和职业分类设置。课程的设置以院校申请、专家评审和政府审批为主，也可由各高等院校自主设置，但接受政府的审批和验收，达到合格标准后授权为“XX省/市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可以分布在各级各类高等院校中，但比重应有所不同，如省市和区县广播电视大学的专业课程可以占全部课程的20%，高职高专院校可以占30%的比例，省市所属院校可以占40%的比例，国家和部委所属院校可以占10%的比例。省/市政府要设置专项基金，对于批准立项的“专业课程”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三) 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的整合是服务城市社会的基础

从纽约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和互动经验看，合作和互动不是与单个大学进行的，而是与全州/市四大高等教育系统即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纽约城市大学系统、非盈利性私立学院和大学系统、盈利性私立学院系统的合作和互动，是分层次、有选择、可衔接的合作和互动。例如，和非营利性私立学院和大学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高端人才和科研成果，和州立大学系统和城市大学系统之间的合作主要是专门人才和应用技术，和盈利性私立学院的合作主要是

护士、牙医、速记员等各类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培训。但是各个系统之间又是相互延伸、衔接和贯通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从而确保整个大学系统能够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全面的服务。与纽约相比，我国现阶段许多一线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事实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分层系统，一般包含三大高等教育系统：省/市属院校系统、短期高等教育系统（高职高专和社区学院）、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有的城市在三大系统之上还存在国家或部属大学系统。因此，从构成状态来看，我国许多城市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具备了服务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格局。但是，为什么现阶段高等教育系统的服务能力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呢？各个系统之间缺乏延伸、衔接和整合可能是原因之一。现阶段我国同一城市内各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相互之间的衔接和整合比较缺乏，有的甚至相互敌视和排斥。借鉴纽约的经验，我国各大城市的高等教育系统可以专业课程的设置和专门人才培养为主线，由省市政府牵头推动各个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衔接和合作。具体而言，可以借鉴纽约“州大学董事会”的做法，在省/市设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或类似常设机构，直属省/市长办公室，由各方面的代表组成，担任协调、认证、顾问等工作，协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和推动各大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在专门人才培养上的衔接与合作，并推动各系统在其他方面的整合。

(郝海霞，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2；陈超，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天津 300071)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四种联动行为模式

甘永涛 唐琼一

对城市和社区而言，美国大学是一个复合型的组织，它不仅是一个开展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机构，而且还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法人机构（Corporation）。作为复合型的组织，大学的活动方式包括开展学术活动（创新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教师专业性服务和延伸教育等）、社会服务活动、公民参与活动。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的研究和知识呈现出了“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趋势，大学也开展了许多针对产业界的创业型（Entrepreneur）活动，如：出售专利和技术转让，孵化企业、创办科技园区等方式。因此，与大学四种不同性质的活动相结合，美国大学融入城市与社区的主动行为总体上具有四种不同的模式。以下结合案例，对美国大学与城市联动的四种主要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

一、学术行为模式

在美国大学的城市与社区融入的主动行为中，最具有意义的方式是：大学在传统的学术方法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创新，产生了新型的学术行为模式，从而服务于社区。其中主要的行为方式包括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延伸教育方式和提供专业服务。

（一）服务学习

1. 服务学习的概念。自从1967年首次提出“服务学习”这一术语以来，对其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概念界定。1990年《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认为，服务学习指学生在积极参与精心组织的服务中得到学习和发展的方法。它既能够迎合社区的需要，又有助于增强公民责任感。同时，服务学习为学生或参与者提供反思服务经历的结构化时间，体现社区服务项目中的教育因素，整合与加强了学术课程。根本上，服务性学习最大的特点是要寻求将满足教师、学生和社区的需求和利益，学校的教育方法以

及公民责任方面的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创新手段。国家与社区服务协会（the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成立后对服务学习作了相关界定：服务学习是一种教与学的方法，它将课程学习与有意义的社区服务联系起来。学生通过服务获得学术能力并且增强社区力量。它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包括提高学术成绩，增强学生参与能力和公民技能，使社区更强大。

2. 服务学习的原则与目标。尽管服务性学习的概念存在着多种阐释，但该领域正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建立了基本原则，即“体验性学习的形式，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参加者将服务结合到学习和课程作业中，并进行结构性的反省、审视和分析。学生提供的服务贯穿于课程和学习的目的。学生提供有意义的服务，解决人文和社区的需求，将学生融入到社区的需求中。”

服务性学习的目标：“社区、教师、学生在制定课程、工作分工和项目目标中是一种互惠互利和平等的关系。学生获得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技能。而社区的专家们由于其经验型的知识而获得了尊重，增加了他们处理社区问题的能力，并且能明确对项目的需求。教师获得了理论、研究、教育一体化的价值认识，大学和社区组织获得了更加紧密的关系、相互的信任和尊重。”

3. 西雅图大学院校实践案例。西雅图大学教务长办公室创建了“学术性服务学习教师基金”项目（Academic Service-Learning Faculty Fellows，简称ASLFFP），该项目在全校范围内推动服务学习。ASLFFP每年从各学院选择一批全职教师参与该项目。工作包括修订课程大纲、整合学术内容与社会正义取向的服务学习、评定服务学习效果、建立服务学习网络、与社区共同组建服务场所等等。教师们还要重点设计聚焦于服务学习行动的研

究项目。

西雅图大学“服务和社区参与中心”为教师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服务学习理论方面的指导，让教师了解服务学习的原则、方法，为教师提供服务学习书籍、网络资源；二是采用工作坊、个人咨询等方法在服务学习的课程设计、过程规划与具体实施方面提供指导；三是协助教师与社区机构（如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等）建立联系；四是鼓励教师参加由高校协议同盟召开的服务学习会议（西雅图大学是高校协议同盟的成员学校）；五是设立专门的教师基金项目，如前述激励教师投身于正义取向服务学习的ASLFFP基金项目。西雅图大学的服务学习实践正在逐年增长。据2008年数据统计，2003—2004学年全校有51位教师、1867名学生参与了服务学习；2007—2008学年，有97名教师和2962名学生（超过全校学生数的40%）参与了服务学习。

（二）延伸教育的方式

延伸教育的方式是由赠地学院的知识推广模式演变而来的城市与社区融入方式，并且在大学的学术职能中存在。其方式采取政府部门、组织和企业一起开展工作的方法。主要分为针对社区居民和设在课堂中的社区（Community in the Classroom）；针对企业和就业需求的劳动力开发（Workforce Development）。

1. 相关概念。课堂中的社区是指为当地居民提供一种无学分的教育。其教育和培训是为了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复兴工作的能力及其管理技能。这些课程通常在大学的社区服务中心进行，或在社区合作者所提供的场所中开展。大学在劳动力开发中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供应进行分析；二是劳动力职业化培训；三是与区域内的企业进行劳动力开发合作项目。

2. 案例：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制造技术嫁接项目（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Bridge Progr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IC）。

通过与芝加哥的一些机构合作，通过制造技术嫁接项目来为芝加哥中心城区的工人进行培训。该项目试图帮助芝加哥制造业解决劳动力短缺问

题。架桥项目与学校、社区、城市和制造业合作举办。通过此种合作关系，该项目增进了参与者技能方面的提升，参与过该项目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更容易被雇佣。

（三）提供专业服务的方式

大学作为知识、创意与创新思想的中心，通过延伸其能力来处理城市社区的整体事务。提供专业服务指的是学生和教师参与针对一个社区的特定项目，此类项目并不直接与大学课程或应用性研究有联系，可以是教师和本专业领域或非本专业领域。专业服务提供的活动类型主要有：住房问题服务；中小企业和组织的能力提高服务；与区域内中小学校合作；为低收入家庭、学业成绩差的学生提供课后辅导、答疑；帮扶移民的英语与文化环境的适应；为社区居民进行创业培训等。提供专业服务活动可能是以大学为主导，并与城市的社区组织合作开展；也可能是城市作为行为主体，大学师生作为成员加入其中。

二、公民参与行为模式

公民参与行为模式指的是大学利用大学的社区和丰富的未来公民——学生的资源，与社区的组织一起共同创造各种形式的为社区居民服务的行为方式。

（一）公民参与的概念

公民生活，实际上就等于“参与”邻人的生活，造福全社区的利益。而公民生活的前提是公民参与，只有参与才能使共同协商成为可能，并在社区层面（可扩展至国家层面乃至全球层面）尽可能使社会共同利益最大化。公民生活是一种日常的生活实践，公民参与是美国理想的民主生活常态。

（二）原则

恩尔利奇（Enrlich, T）教授认为，公民参与的核心问题应是努力使社区公民生活有所改变；形成促使改变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动机等方面的结合；它意味着通过政治和非政治的过程（步骤）改善社区生活质量。而公民参与的目标就在于根据社区的真实需要开展社区服务，将理论学习中的知识运用到改善社区生活问题中去。在参与过程中，师生是以学术性公民身份参与公共生活的，并在参与中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公民。这种学习和服务的结合也正是人的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在行动

中、在参与中的形成与发展。

（三）案例：拉特格斯大学“基于教育的社区服务项目”

由本杰明·巴伯创建的“基于教育的社区服务项目”，其目标是培养公民。“如果我们不是作为公民联结在一起，我们就会在种族、民族或性别的名义下联结起来，这将以隐含的方式加重敌对的差异。”新泽西州立拉特格斯大学于1989年开始推行的公民教育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的创新计划，名为“基于教育的社区服务项目”（Educational-based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又称服务学习），该项目制订出九大实施原则。第一，实践是传授公民技能和公民责任感的首要途径，公民教育只有在社区服务或其它类似形式的活动辅助下的经验学习中才会有效；第二，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的关系只有在真实的社区行动中方能显现；第三，社会问题，包括年青一代的冷漠和异化问题必须通过公民社区的重建来解决，因而基于经验学习和社区服务之上的公民教育比那些孤立的、零碎的方案更有效；第四，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服务的互动极有可能消除他们的冷漠、褊狭和偏见，使他们尊重美国生活的多元化；第五，社区参与能增强学生自我效能感从而增进他们的公民责任感；第六，无论经济背景或阶级差别，所有学生都要修习公民教育课程；第七，公民教育课程应采取小组学习形式，有助于学生形成共同体；第八，公民教育中的社区服务因素指的是服务公益同时也实现自利；第九，公民教育应被视为自由教育的整合部分，应规定学生选修并计算学分。

在拉特格斯大学“基于教育的社区服务项目”中，学生作为公民扮演了具有自主性的个体角色，通过辩论、倾听、商议、妥协、决策等学习过程将个人关注与社区需求结合起来，显示了其公共性和教育性，体现了追求民主生活的手段，也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理想的目标。

三、社区服务行为模式

社区服务导向方式指的是大学利用大学的社区和丰富的资源，与社区的组织一起共同创造各种形式的为社区服务的行为方式。

机构的社区服务主要形式有：大学利用其设施和活动把社区成员吸引到大学，与大学师生共享大

学优质资源。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大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些活动都对当地居民开放。例如，大学有许多有特色的博物馆，如科学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植物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生物学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大都对外免费开放，或者收费很低，并对儿童和老人实行优惠票，在规定的日子可以免费参观。大学的研究生讲座每年都邀请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政治家到大学演讲，所有演讲都免费对外开放。设有音乐系的大学在大学的音乐厅中举办免费音乐会，晚间和周末的音乐会则收取一点费用，并对老年人、学生和团体优惠。大学的娱乐俱乐部对社区成员开放，社区成员交纳会费，便可使用其中一项体育和娱乐活动的设施，如田径场、游泳馆、网球场、体操馆、举重馆、羽毛球馆、手球馆、橡皮球馆和其他专项体育设施。大学的空旷地带、野餐区、徒步旅行区等场所，都对社区成员免费开放。

机构的另一种主要的社区服务形式是支持中小学教育。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通过中小学—大学伙伴关系计划和早期学术推广计划，与海湾地区的中小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教师提供提高课程，改善其教学水平；参与中小学课程建设，帮助中小学改进课程；为学生开设各种课程，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准备升学考试的能力、适应大学生活的能力；对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指导，提高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目的性和针对性。该校每年要花费280万美元，帮助海湾地区改进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育。

四、创新行为模式

创新行为模式指的是大学利用其具有商业化前景的研究成果、技术许可和专利等资源，与地方社区的政府、企业合作，促进当地社区的创新产业发展的方式。

这种方式起源于硅谷等技术都市的成功模式。人们传统所谓的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电子工业集中地。它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微电子技术高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其特点是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企业、大学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而实践证明这些问题是无法由单方面来解决的。官产学合作是政府、企业、大学三方优势互补的自主行为，官产学合作的主体是企业，合作可视为企业运营的一种战略和组织行为；政府的政策激励、制度规范和对合作的引导和影响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大学是官产学合作机制的动力源泉。开展政府、企业与大学的有效合作，是建立科技和经济密切结合的新体制和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有效措施，也是当今经济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

创新行为方式确实给大学与城市联动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最广泛、最有效的途径。但另一方面，尽管国家政策为全面的创新建立了舞台，创新活动的集中点还主要是在区域内高层次合作行为基础之上，对于许多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衰败的社区中，大学通过创新活动方式融入社区存在着极大的障碍和局限性。美国学者阿提拉·瓦格（Attila Varga）研究发现，大学知识转化的强度是与地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程度强烈关联的，并且呈现出正态的相关。比如，高技术产业的中心，从旧金山湾区到波士顿地区都是美国经济基础和商贸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研究发现在主要政策的含义是：强调大学作用，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可以是经济活动发达的都市地区的良好选择，但不一定是一个缺乏高技术产业地区的政策选择。对于后者，需要更为全面的策略，包括一个综合的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目标不仅仅是强调大学机构的作用，还要包括构筑产业基础、吸引投资、加强商业服务和小企业的发展等。而且，企业孵化、企业发展活动都共同面临着一种挑战：它们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短期的解决方案。孵化器的增长和发展需要多年甚至是几十年才能有结果，并且需要公共部门和大学的长期投资和重视。

五、结语

美国大学与城市的联动行为是建立在大学的各种资源基础之上的各种形式的主动行为，大学通过与城市社区的行为主体结成协作关系，而更加富有成效地处理和解决大学与所在城市及社区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促进城市和社区的发展和复兴。不同的大学依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和社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融入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都建立在大学不同性质的活动基础上。学术行为模式是建立在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延伸教育和提供专业服务活动的基础之上的。这对于大学与城市的融入很有意义，因为它们将大学服务城市和社区的理念与大学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学术的追求进行了良好的结合，不仅调动了以学术活动为核心的广大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还将服务的活动和社区的价值纳入了学术活动的范畴，使其在传统的学术评定中具有了正当的地位。公民参与行为模式是建立在大学利用大学的社区和丰富的未来公民——学生的资源，与社区的组织一起共同创造各种形式的为社区居民服务的行为基础之上。社区服务模式是建立在大学的社会性活动基础之上的，指的是利用大学丰富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网络联系与社会的影响力，通过与社区协作来服务于城市。创新行为模式建立在大学利用其具有商业潜力的研究成果、技术许可和专利基础之上，形成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发展模式，进而以创新活动的主体即大学、产业和城市社区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互动发展过程，从而塑造知识创造者和知识商业化相互联系的理想场所，如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文化、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等。

（甘永涛，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北武汉 430074；唐琼一，杭州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1121）

（原文刊载于《高教探索》2011年第4期）

美国大学与城市在房地产开发上的冲突与合作

饶燕婷

大学曾一度被看作是远离尘世喧嚣，专注于探索真理的场所，然而，随着其职能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经济贡献的日益显著，它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社会的核心机构。今天，在给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强大的辐射效应的同时，大学也将其传统校园的边界不断延伸到周边城市社区，成为城市地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开发者之一。由于土地购置与开发的复杂性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许多大学在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与驻地城市发生了各种冲突与合作。本文以美国大学与城市在土地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美国大学校园扩张的现状、动机、与城市社区的冲突及合作策略等进行解析，以期对美国大学的房地产开发情况及其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所了解和把握。

一、大学房地产开发：城市校园的扩张

城市是大学的诞生之地，中世纪欧洲最早的大学发轫于城市。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等中世纪大学都是以城市命名，已足以证明大学与城市的渊源。正如托马斯·班德在《大学与城市：从中世纪起源到现在》一书所指出的：“大学是城市的产物”。城市的发展孕育和催生了大学，并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美国大学移植于欧洲模式，在传统上一直位于城市地区，除了后来在乡村地区建立的小型文理学院和大型赠地学院之外。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在首都建立了华盛顿大学，之后许多大城市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大学，以作为实现其名誉、荣耀和进步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和大学出现了急剧的扩张，尤其是大学，由于生育高峰一代进入大学，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教育机构开始以该时期交通部门建设高速公路一样的方式进行扩张。大学的占地也因此成为大学管理者与驻地政府之间经常出现的一个议题。到20世纪末，城市重建以及在经济活动、新移民和国家财政供给缩减上的变化使城市陷于困境。没有强有力的市政领导，再加上不断增加的内外部压力，大学不得不认识到他们必须并能够同时成为增进普遍知识和提高地区福祉的机构。因此，肩负“赠地使命”的“城市的大学”为了城市的目标越来越多地发挥着

“入世”机构的作用，将其传统校园的边界向城市社区延伸。截至今日，美国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学位授予机构中有82%位于城市地区，并且大部分聚集在50个州当中的28个州之中。

根据威沃尔等人于1998年至2005年间对美国位于城市地区的非营利性高校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研究，在被调查的604所高校中，有225所（37%）高校正在将其校园扩展到外部或周边，并且这些正在向外扩张的高校中有116所（52%）高校有2个或以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从项目开发的目的是来看，在225所高校的506个地产开发项目中，101个项目是为了建构学术空间、94个项目是建构综合利用空间、59个项目为了增加住宿空间、43个项目专注于科研，41个项目是为了新校区和分校区的建设，此外还有一些项目是为了建设艺术、体育设施、学生服务中心等。总的来看，60%即302个地产开发项目与大学的学术使命相关，包括为学术、管理、艺术、体育、科研、住宿、学生中心，以及新校区和分校区的目的而建构。另外，据调查到1996财政年度末美国城市高校已持有近1000亿美元的陆地和建筑（账面价值），其中仅1995—1996财政年度就新购置了80亿美元的地产。“大学和学院已经成为其所在城市的最大土地所有者和开发者，对建筑环境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二、美国大学房地产开发的动机

美国大学进行房地产开发是多种动机驱动的结果，主要包括满足学生住房、娱乐体育设施，以及教学科研设施等不断增长的需求；提升校园周边环境，促进城市振兴的需要；为学校创收等。

1. 空间拓展的需要。美国大学房地产开发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了满足校内住房和娱乐体育设施不断增加的需求。在1970年到2009年期间，美国大学入学人数增长了138%，并且这种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此外，许多美国大学过去只是为新生和部分学生提供住宿，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通过增加学生宿舍和体育娱乐设施从走读型学校向更加传统的寄宿型学校转变，例如，南佛罗里达大学、西北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韦恩州立大学等。因而，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学生宿舍与体育娱乐设施的增加使传统校园变

得日渐拥挤和局促，对空间拓展的需求也越发迫切。除了住房和娱乐设施之外，科研设施的增加也对大学提出了空间拓展的要求。二战后美国大学加大了科研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力度。在1970年到2009年间，大学科研在美国所有研发中所占的比率从约10%上升到约14%，在研发份额上仅次于企业界而位居第二。并且，美国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在2009年开展了全国53.4%的基础研究。大学对科研的专注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科研设施的增加。据统计，在2001年至2005年间有科技研发的高校在校园内为科研工作新建的空间比1988年以来的任何一个5年周期都要多，仅在2003—2005财政年度之间就为科研增加了1.85亿平方英尺的可用净空间。

2. 提升校园周边环境，振兴城市社区的需要。提升校园周边环境和促进驻地城市振兴是美国大学除学术使命之外的另一个房地产开发动机。大学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社会机构，往往定址在一个地方后上百年都不再迁移，因而通常都希望学校周边能有一个较好的经济、文化和治安环境。对于学校周边社区的衰落，过去不少美国大学采取的回应是在校园外面砌起围墙或是加强警察和保安服务。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尝试通过开发零售商店与住房、修缮历史古迹与公园、改进当地学校、甚至为所在地区提供卫生和治安服务等方式来刺激城市经济和社区的发展。据威沃尔等人的研究，在被调查的506个大学地产开发项目中，包括了12个大学建立的K-12学校、9个零售店、5个博物馆与文化中心、5个商业中心和商业孵化器、7个早期儿童护理与教育中心、2个青少年中心，以及一个为年长的社区成员提供膳食的营养中心。实践证明，这些房地产开发活动对当地经济有显著刺激作用。大学也因此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城市复兴计划的一个重要力量。

3. 增加学校收入来源。许多美国大学通过建造综合建筑或是购买商业和工业地产来为学校创收。这些物业将来不仅可以租赁出去，并且还有利于学校对校园周边发展的控制。例如，美国伊曼纽尔学院就通过出租或出售未开发的校园地产来促使学校收入来源多样化。由于默克（Merck & co）公司与哈佛大学联合在该学院建造了一栋默克科研大楼，为此默克公司提前预支了75年的租金，这使该学院的基金立刻从700万美元增至4900万美元。此外，纽约市的库伯科学艺术发展联盟以土地资产作为学校收入来源有80多年之久。该校持有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与其他地产收入加起来正好有2000万美元。这意味

着可以为该校提供年度运营预算的一半，并确保学校的免费教育承诺为所有学生提供所需的学费。今天，在那些有稳定的房地产收入来源的美国大学，其捐赠基金几乎有一半是来自房地产收入，还有另一半来自证券投资收入。

三、美国大学与城市在房地产开发上的冲突

美国大学在内部和外部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不断追逐传统校园边界之外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越来越多地侵入周边社区，并由此引发了与城市的广泛冲突。据相关研究发现，几乎每个美国大学房地产开发项目都与大学外部群体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究竟是因什么而引发的呢？虽然不同的大学甚至是同一大学的不同开发项目都可能因不同的原因而与城市发生冲突，但是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普遍的冲突来源：

1. 社会公平问题大学在校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一方面使其成为城市振兴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担心的社会公平问题。由于一些大学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社区重建政策很少考虑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存状况和需求，因而社区居民、商业和非营利机构等纷纷指责大学的扩张导致了常住居民和商业的迁移、忽视了低收入阶层的需求、破坏了历史遗迹等。一些利益相关者甚至提出，教育机构忽视社区社会问题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已经营造了一种不信任的气氛。

哥伦比亚大学是纽约市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仅次于天主教教会和市政府。该校在西哈林地区建一个巨型分校的计划引起了周边社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因为大学的扩建会带来社区中产阶级化，从而导致该地区长住居民和商业的搬迁。同样，20世纪80年代后期华盛顿大学宣布要在塔科马市建一个新校区。尽管新校园的建设刺激了对当地贫困地区的投资，保护了一些历史建筑，并得到了一些部门的强力支持。然而，附近低收入社区的居民却抱怨，该大学忽视了他们的需求和关注，只提供了高端工作。另外，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IUPUI）虽然帮助带动了印第安纳波里斯市的发展，但是也改变了市区的阶级和种族构成，并破坏了该市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一个历史区。

2. 负面溢出效应。所谓负面溢出效应是指大学的房地产开发活动在实现大学扩张目的的同时，会对大学之外的人或群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也是导致大学与城市社区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大学相比，社区居民更加关注与生活质量有关的问题，例

如担心新建学生宿舍会影响社区的特性、租金上涨的压力、商店和公共设施对学生市场的迎合，以及交通、噪音和停车等问题。

大量学生的出现是大学房地产开发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溢出效应，也是社区居民的最大顾虑。一方面他们害怕大量新建学生宿舍会改变社区的特性；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大学生都不住校而在附近社区租房，社区居民们往往未做好准备或者不愿意接纳他们。以波士顿大学为例，2006年该校的62,000名大学生中有42%不住校，而是分散到波士顿的所有20个社区中，并且仅有半数的学生集中在其中4个社区。这给波士顿市的居民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此外，一些大学房地产开发项目由于用途不受欢迎也遭到社区居民的抵制。为了维护社区的良好生活环境，社区居民通常不愿意大学在附近建造体育馆、剧院、停车场等交通密集的建筑，以及用作工程维修、火警、紧急医疗、集体宿舍等噪音密集的建筑。更有甚者，一些社区甚至因为美学原因反对大学的房地产开发。例如，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在扩张到附近住宅区时就曾因为其现代玻璃结构与传统住宅区不协调的问题而遭到社区的反对。

3. 地区划分美国大学在房地产开发时经常与城市在地区划分问题上产生纠葛。在美国，如果州没有特定协议或相关立法的话，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过去都不受本地区划管理。然而，近年来各市政当局却越来越倾向于使私立大学服从地区划分。这使得那些不愿被大学侵入的社区可以利用地区划分来抵制和反对大学的扩建项目。从其对抗形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既有的地区划分来反对大学扩张到居民区；二是为了制止某个大学的扩张活动而试图改变现行的地区划分。此外，大学周边的居民还常常建立邻里或社区协会来反对某个分区决定，并抑制大学进一步扩张的更广泛威胁。在大学进行物业购置和地产开发的过程中，这些社区组织通过集中公众意见、游说当地政府、与大学进行谈判并签订合同或协议，经常使大学的开发项目陷于停滞。例如，洛约拉学院（Loyola College）周边的社区居民建立了一个北巴尔的摩邻里联盟（The North Baltimore Neighborhood Coalition），该联盟与洛约拉学院签订了一份十年有效期（1995年至2005年）的法律协议。这份协议对该校扩张到其校园边界之外的能力进行了限制。因此，当洛约拉学院购买了一个疗养院并打算将其改造成学生宿舍时，该联盟利用协议有效制止了这个项目。

4. 财产税的减少。美国大学享有免税资格，其

购置的不动产可以免征财产税。然而，大学不交税并不意味着城市就不再提供相关服务了，附近社区仍要提供治安保护、道路养护、周边甚至校园内的污水处理系统等。因此，大学的扩张范围越大、不动产越多，城市政府的损失就越大。尽管大学对地方经济和社区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其免税资格也日益成为一些城市政府关注的问题，以及引发大学和城市争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在校园西北角购置了一块技术广场。到2005年时，该项目已包括60万平方英尺的生物技术研发实验室、54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和零售空间，以及1600个停车位，每年缴纳的房地产税占坎布里奇市所有房地产税收的2.8%。因而，市政局和市议会害怕麻省理工学院会将这些建筑用于教学或科研的目的，因为这些用途的建筑是免税的，会大大减少该市的税收收入。

四、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合作策略

尽管美国大学在房地产开发时与驻地城市发生各种争端和冲突，但是也有不少大学通过积极的实践避免和化解了这些冲突，甚至成功地与驻地城市和社区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从这些大学的实践来看，主要包括以下策略：

首先，使经济和社会项目相结合，缓解社会矛盾。“有效的土地开发政策要求社会和经济项目的协调”。为了避免和减少房地产开发给周边地区带来的社会问题，一些美国大学在进行房地产开发时注意为当地居民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住房以防止居民被迫迁居。并且，一些大学还为周边社区的供应商提供优先权，积极促进了当地企业的发展。位于波士顿市的东北大学在开发达文波特一考门斯项目（Davenport Commons project）时，与当地一家社区发展公司和两个本地开发商合作，为周边社区提供了一项保障性住房的福利，并帮助业主成立了一个共管协会，有效缓解了各种社会矛盾。

其次，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减少负面溢出效应。为了平衡大学、社区和整个城市的利益，大学房地产开发中的各方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协商与共同规划来解决各项争端。例如，波特兰市规划局与大学和社区协会合作建立了“大学区计划”，对大学的需求和公众对市中心的愿景进行整合。该计划要求建设综合功能建筑，为交通、零售、学生住房与商品房、便利设施，以及教学设施提供了建造指南，并为将来的土地利用提供了所需的监管框架。此外，圣荷西州立大学2006年与驻地

城市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开展一项为大学在周边社区开发提供指导的联合规划。该伙伴关系拟为附近社区居民提供更多娱乐设施和体育比赛场地，并专注于改善整个地区的停车和人行通道。除了这种与社区和城市的合作之外，美国大学也很重视与州政府机构或联络机关，以及其他大学的合作，通过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效避免了各种可能的冲突和风险。

再次，通过设计实现校园与城市的整合。现代城市校园的开发理念不再是将大学从其周边环境分离，而是更趋向于促进大学建筑与城市社区的整合。美国大学在进行房地产开发时越来越多地遵循以下两个原则：通过建筑环境来传递大学的价值观念、找到与当地社区的交集。例如，在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南校区，大学建筑就是“城市的建筑”，城市服务和零售商店与教学设施和学生宿舍混合在一起。雪城大学则建造了一个1.5公里长的L形连廊，通过使大学建筑与城市风景、自行车道、照明、公共艺术和互动艺术，以及标识系统连接起来，实现校园与城市的整合。这个连廊不仅使学生和教师能到达市区，也使市区能从大学和周边的25个艺术与文化场馆中受益。

最后，补偿免税资格。为了补偿学校的免税资格给城市带来的税收损失，一些大学与城市协商缴纳一定的金额以替代税费或其他费用。这种补偿形式在美国并不鲜见，近年来一系列与代税费有关的实践、政策和项目在州、市两级政府层面都相继出现了。事实上，早在1929年哈佛大学就曾对地方政府进行了税费补偿，这也是第一个有记载的大学向地方政府缴纳代税费的案例。今日，哈佛每年要向其主校区所在的坎布里奇市交纳200多万美元，向学校新近购置土地的沃特敦市交纳380万美元。此外，该校2008年还向波士顿市交纳了190万美元，因为学校有几个医学院和研究中心位于该市，并且即将在这儿建造新的设施。

五、结语

美国大学与城市在房地产开发上的冲突与合作是考察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一个棱镜。虽然许多大学在进行房地产开发时与驻地城市和社区发生了激烈冲突，然而，不少大学通过积极实践却成功化解了矛盾，甚至使双方关系从对抗转向了合作。综观美国大

学与城市在房地产开发上的互动，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1）寻找与城市和社区的利益结合点，通过共同目标整合各方利益。在大学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大学与城市和社区之间除了利益冲突之外，也有利益交集。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减少各种阻力，美国大学积极寻找与城市和社区的利益交点，不仅关注开发项目给学校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同时重视给周边城市社区带去福祉。（2）联合利益相关者携手开发房地产项目。美国大学通过与城市、社区、开发商和其他大学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联合，使其参与土地利用与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决策，甚至合作开发地产项目，为开发项目构建了一个缓冲带，有效减少了各种冲突的发生。（3）将大学房地产开发项目置于更大的城市结构之中，使其融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城市是大学生长的土壤，大学是城市的一部分。美国大学在房地产开发时，尽可能使其土地和建筑政策植根于更大的城市环境之中，实现与城市的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我国自上世纪末高校扩招以来，全国大部分本科院校都扩建或新建了校区，且不少城市还将大学城开发建设纳入了城市规划建设的蓝图之中。据有关数据统计，全国高校在新校区建设中投入的资金，以及现已新建成的建筑面积都大于这些学校自解放以来、新校区建设以前50年投入基建资金和建筑面积的总和。并且，各地大学城占地面积也已达两千多平方公里。我国大学与欧美大学一样主要位于城市地区，因此这些发展速度快、占地规模大的大学房地产开发项目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和社区带来直接影响，引发各种冲突。从美国大学与城市在房地产开发上互动实践中，我们可以有所警示和启发。为了实现大学与城市的更好融合，确保大学房地产开发项目的顺利实施，大学在进行房地产开发时应将开发项目置于整个城市的大背景之下，关注城市和社区的需要，重视利益相关者在校园规划和开发项目讨论中的参与。

（饶燕婷，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后，上海 200240）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2期）

英国大学与城市协同发展的案例分析

——以伦敦大学与伦敦市互动为例

沈 忱 郝海霞

19世纪，社会的不断发展推动大学走出“象牙塔”，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由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扩展到“为公众服务”，并被看作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英国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也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传统大学逐渐实现“对外开放”，在与城市的冲突中走向融合，此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促进了伦敦城市化的进程，在伦敦社会对技术科技的强烈需求下，伦敦大学应运而生。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伦敦大学已与伦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实现了深度联结。伦敦大学建立的初衷就是服务于城市，回应城市的需要，适应城市的发展节奏和格局。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世界的金融中心，为伦敦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和契机，正所谓“遇强则强”，伦敦大学与伦敦市的协同发展使二者互利共赢，相生相息。

一、伦敦市与伦敦大学的历史溯源

伦敦在中古时代成为英格兰的首都，是基督教会、王室和政府的所在地，16世纪后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伦敦政治中心的地位得以巩固，19世纪，伦敦在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大规模的发展，新的博物馆相继建立，横跨泰晤士河的地理优势为其带来巨大的商机。伴随着英国产业革命，伦敦城市化进程加快。19世纪中期到末期，一场在首都建立一所“教学型大学”的动议讨论热烈，伦敦是这所热议中的大学的校址所在地。最初关于大学是建立在伦敦郊区还是城市中也是争论不断，最后决定建立在城市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伦敦大学的校园并没有集中于一个唯一的地点或者就在周边扩散，而是分布到了整个首都，为首都所接纳，与首都融为一体。建立一所“伦敦人的大学”不仅是实现与地方联系和服务使命的“城市大学”，更与伦敦“世界大都市”的品格相符——伦敦大学不仅是城市的，更是国家的，甚至是世界的。

伦敦大学延续了中世纪传统大学自治的精神，不同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是非宗教的、世俗的，由议员、学者和商人共同推动创办。1836年伦敦大学由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合并而成，并获颁皇家特许状，创立之初是各成员院校的考试机构。1858年，伦敦大学以其开放的态度开始接收来自各地的学生，到19世纪末，伦敦大学逐渐发展成一个联邦“教学型大学”。此时的伦敦大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支先锋力量，她将许多新的课程引入到大学教学，包括现代语言和实验室科学。1878年，伦敦大学成为英国第一所承认妇女学位的大学。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如今的伦敦大学已经成为包含17个独立自治的学院和10个研究所的联盟，每个学院都有独立的大学地位和高度的自治权，部分学院甚至能独立颁发文凭。伦敦大学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与伦敦这座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今的伦敦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和世界的金融中心；伦敦大学也实现了当初建立的初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二者的发展相得益彰。

二、政策引领伦敦大学的变革与发展

伦敦大学在快速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在《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并建构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模式”。他认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受政府、市场及学术权威三种势力的整合影响，肯定了政府调控对大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中心，伦敦大学的建立和发展都与伦敦市政府的政策支持息息相关。1836年的法案规定伦敦大学是一所独立的享有学位授予权的考试机构，有权设计考试、任命考官并向通过考试的学生授予学位，参加考试的学生需到认可的学院和学校进行课程学习。此时的伦敦大学只单纯的负责学位授予，将大学与教学完全分离开。1858年对法案进行修订后，伦敦大学的考试完全向所有愿意参

加考试的人开放，伦敦大学从此向外界开放，接受来自各地的学生。除医学生外，拿到课程学习证明的学生可以选择到其他学院或当地的中心去参加考试，学位获得者的范围增加，使考试与教学之间的冲突随之扩大。为平息这场风波，政府颁布了《1898年伦敦大学法》，成立伦敦大学委员会，对伦敦大学进行改组。伦敦大学不再只是一个考试机构，而是向“教学型大学”发展，并开始关注课程内容和学位质量。由于伦敦大学的逐渐向外开放，到了1908年，英国伦敦大学有4000多注册学生，已经超越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数量。随着英国政治家认识到大学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1919年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创立，UGC是英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中介机构，其主要工作就是争取和分配高等教育资金，直到1989年存在了70年之久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撤销，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尊重大学自治基础上为伦敦大学提供了财政支持并推动了伦敦大学的发展。二战背景下，1945年公布的珀西报告（Percy Report）和1946年公布的巴洛报告（Barlow Report）这两个政府报告都强调了科技教育的重要性，1953年英国政府决定加强一批大学的理工科系建设，特别是扩大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规模，以培养技术人才推动科学技术的应用。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到知识经济的时代，各国在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强，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注重利用其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伦敦政府发布的《2003—2006年伦敦创新战略与行动计划》（The London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2003—2006）、《伦敦1991—2021：建设世界城市》（London1991—2021: The Building of a World City）等呼吁利用创新技术和科学知识促进城市发展的战略指南和行动规划中，肯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城市创新与变革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伦敦大学作为伦敦高等教育的主要力量，在伦敦向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技术和知识支持。

三、伦敦大学与当地企业的互利共赢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认为“大学作为

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以及零售商，不可避免地需要向社会提供服务”，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其著作《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2002）中，针对不同流派对大学应以何种程度回应社会需求的角度对大学的社会责任进行了论述，而伦敦大学与伦敦当地企业的互动实例很好地说明了大学如何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伦敦大学是英国工业革命催生的产物，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和欧美各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多更高的需求。早期的伦敦大学与当地企业呈现的是大学支持企业发展的状态，主要满足伦敦生产企业里低水平的技术需要，如食品、肥皂、玻璃和水泥等。19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转变到主要的应用科学和研究，如1907年建校的帝国理工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包括电气工程、天然气、工业染料等方面的高技术，1914年伦敦大学参与了农业和航空业的发展。随后，企业逐渐认识到大学能为其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服务的重要性，伦敦的各大企业、公司甚至私人纷纷捐款资助伦敦大学办学，如19世纪末，许多企业家出资在伦敦大学建立与电子工程、电机工程以及工程学有关的讲座、实验室和研究所。

现如今伦敦大学与当地企业的互动更为开放和紧密，注重并联合企业的力量，不仅企业的发展得到伦敦大学的高新技术和知识的支持，伦敦大学在开展研究项目和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得到了企业的慷慨资助。如伦敦商学院为企业提供商业上的咨询与帮助，教师和专家以其创新性的研究给企业带来显著的业务优势，伦敦商学院建立了商业研究所或者研究基金。如进行研究和创新的德勤研究所（the Deloitte Institute）和私人投资的科勒研究所（the Collier Institute），以此更有针对性地围绕企业长期或短期内的商业问题进行商业服务。伦敦商学院还要邀请企业设立奖学金以对优秀的学生进行资助，联合为商界培养优秀人才，主要包括以企业命名和企业自命名两种奖学金设立方式。如劳埃德银行集团（Loyds Banking Group）为女性学者设立的劳埃德MBA学者奖学金和沃达丰集团（Vodafone Group）设立的沃达丰奖学金，此外企业也为商学院实践教学地开展提供场地和人员的支持，如“商业体验周”（Business Immersion

Week)项目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咨询公司、品牌管理公司、投资银行、跨国公司和零售业巨头等不同商业组织,为学生提供参观各种商业组织和了解不同商业环境下的知识的机会。在体验和访问期间,学校安排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常为学校校友)对公司进行介绍,并与学生展开有关问题的交流与讨论。大学以其优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人才资源为企业带来利益,以此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参与到大学的研究项目的开发和人才培养的合作中,二者呈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互动局面。

四、伦敦大学与伦敦的深度融合

不可否认,是伦敦孕育了伦敦大学,促进了伦敦大学的蓬勃发展。伦敦大学的诞生和成长已经与伦敦的发展实现深度融合,伦敦的城市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伦敦大学的风貌格局,城市的产业结构影响着伦敦大学的专业结构,在学科专业上重点向金融、法律、经贸等扩展,使伦敦的金融业居世界之首。伦敦作为英国首都的地位和特点也深刻影响了伦敦大学的发展格局,伦敦大学是英国高等教育的翘楚,也与伦敦一样占据着领导地位。伦敦大学散居在伦敦城,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城市文化、经济、政治各个方面已渗透到伦敦大学的生存与发展中,伦敦大学也成为伦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伦敦“国际大都会”的发展定位也为伦敦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契机,二者携手共进,走向世界。

伦敦大学建立的初衷就是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公共利益。在摄政后期和维多利亚初期的伦敦,正是首都的卫生设施状况和居民一般的健康状况引发建校者推动了医学系的开办,而伦敦大学医学院的创办意味着伦敦大学的正式开办,于1895年成立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建校者们非常关心贫困、健康、教育和社会流动等城市问题。可见,早期的伦敦大学就已将其使命付诸于服务社区的行动中。当今,伦敦大学在与社区的互动中遵循七个原则,也称诺兰原则(the Nolan Principles),即无私、诚

信、求实、负责、公开、诚实和引领。伦敦大学建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致力于围绕“人与社区”“金融与经济活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项核心使命持续为公众谋取利益。在“人与社区”层面,伦敦大学承诺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的雇主,维护员工的利益,鼓励和支持员工参与有利于更广泛的社区和社会活动,为员工的发展提供指导与支持,并向公众开放学校的基础设施,积极向当地社会、英国教育部门和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在“金融与经济活动”层面,伦敦大学公开其财务活动,规范其经济财务方面的管理制度,并加强财务监管;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层面,伦敦大学实施碳管理计划,旨在到2020年,实现碳减排43%(从2010年基准),减少资源浪费并增加资源的回收,鼓励员工步行和使用公共交通的绿色出行方式,为社区环境保护献力。伦敦大学社会责任的确立使其能更有目标、更全面地服务于所在社区与城市。

从伦敦和伦敦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伦敦大学是伦敦城市发展的产物,伦敦大学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伦敦人的教育抱负和伦敦社会发展所需,伦敦大学与伦敦共进共退。虽然曾经的伦敦大学的发展受到伦敦的牵制,是“为伦敦而生”,大学按照城市的发展轨迹而发展,但是历史的交织使二者早已在过去的历史中逐渐走向和谐,伦敦大学在合理回应伦敦的发展需求的同时不忘尽职尽责履行其社会责任,伦敦在给予政治、经济扶持的前提下尊重伦敦大学的学术自治与自由,二者“齐头并进”,实现了协同发展。如今的伦敦不仅是英国的心脏,更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而伦敦大学同样不仅是伦敦的名片,更是英国的甚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朝圣之地”。

(沈忱,天津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天津 300072;郝海霞,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8期)

英国城市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

——基于利物浦大学的个案分析

茹 宁

大学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进入21世纪，大学对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逐渐被认知，如何使大学与城市开展实质性的互动合作，成为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利物浦大学是英国著名的城市大学，其100多年来的成长经历颇为完整而典型地呈现了英国城市与大学的互动发展。本文着重探讨利物浦大学如何围绕城市发展合理定位与规划，从一所城市学院发展成为著名综合性大学的历程，并由此分析其对于推动我国城市与大学互动发展的有益经验。

一、利物浦城市的历史发展与特征

利物浦城起源于1207年，但直到16世纪中叶，利物浦还只是一个人口只有500人的小镇。1715年，扼守北大西洋入海口的大英帝国，为了发展奴隶贸易和工业贸易，在利物浦建成了英国的第一个船坞。随着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利物浦得到巨大发展，成为英国工业和海外运输业的重要支柱。19世纪初，已有40%的世界贸易通过利物浦船坞，利物浦成为来往于美洲“新大陆”、非洲和远东的主要进出口基地，并成长为当时英伦全岛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都市。

然而，利物浦不久即遭遇了衰败，这源于航道环境的恶化。20世纪中期，泥沙淤积堵塞了航道，但清除泥沙的成本相当于再建一座新港，新兴的远洋运输业务开始向英格兰安普敦港转移。此外，飞机运输业的出现，也致使利物浦大部分与港口运输相关的行业迅速萧条。更大的打击是德国纳粹的轰炸，1941年的“英国大轰炸”让利物浦的工业成就彻底化为废墟，战后重建依然无法让其重新振作。利物浦城由此逐渐失去了活力，失业率上升，本地人纷纷赴外谋生，至20世纪80年代初，利物浦的失业率是英国大城市中最高的，利物浦也沦为欧洲最贫困的城市之一。

要摆脱贫困，利物浦就必须实现产业转型，寻

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利物浦是英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拥有世界上的第一个包围式组合船坞体系。市内还有许多独具风格的历史建筑，如著名的圣公会大教堂、利物浦大学的红砖建筑群等。披头士乐队的登场、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利物浦注入了新的城市文化元素。利物浦人于是利用这些资源大力开发城市旅游业。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高达100亿英镑的政府和民间投资被用于开发城市的历史文化宝藏。港口地区成为城市最有吸引力的部分，曾经荒废多年的阿尔伯特船坞被整修一新，几座巨大的仓库分别被开发成摄影棚、博物馆、餐馆、书廊和商店。美不胜收的港口景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逐渐成为利物浦新的经济产业支柱。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与之配套的服务产业，如旅馆、餐厅和俱乐部等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物浦实现了城市发展的重要转型，逐渐从工业码头的衰落中走出来，走向文化、商业、旅游业的兴盛，经济随之复苏。今天，作为英国人口的第五大城市，利物浦是全英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利物浦的成功复兴使其在2004年获颁“世界文化遗产”。2008年，利物浦又击败了伯明翰、布里斯托、牛津以及联合竞选的纽卡斯尔和格特海德，当选为2008年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英国文化大臣乔威尔（Tessa Jowell）认为，利物浦当选为“欧洲文化之都”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今天的利物浦人不仅看到了工作岗位两位数的增速，更看到了物质和精神双丰收的前景”。

二、在“城市大学运动”中萌生的利物浦大学

在利物浦城市的中心地带，有一大片醒目的红砖建筑群，它们与城市浑然一体，构成了亮丽的风景区，这就是利物浦大学的校园。利物浦大学建于1881年，在19世纪英国“城市大学运动”中产生，

当时的城市大学大多采用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建筑，因此也被称为“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y），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设计也是利物浦大学的典型建筑特征。

“城市大学运动”是针对以“牛桥”（Oxbridge）为代表的传统古典大学而兴起的。工业革命爆发以后，英国社会越来越需要掌握专业知识的科学技术人才，但是，中世纪以来深受宗教势力影响的古典大学，一味强调绅士培养和贵族教育，而拒绝自然科学知识进入大学之门。尽管“牛桥”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已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但由于它们与英国上流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英国政府对大学实行不干涉政策，传统大学因而一直独占“鳌头”。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世纪之后，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才开始对绅士文化进行反思，而此时的英格兰仍然仅有牛津、剑桥两所大学。1836年建立的伦敦大学，首倡专业教育和科学教育，这才开始动摇“牛桥”的保守传统。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些地方政治家、实业家与学者聚在一起，以教育功利主义和世俗化为旗帜，以地方城市为“突破口”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城市大学运动”。他们出资在英格兰的各重要城市陆续创办了十余所以“宗教无甄别”、课程讲实用为基本原则，以培养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新式高等院校，统称“城市学院”（civic colleges）。这些城市学院大都围绕地方经济特色办学，逐渐成为促进地方工商业发展的教育和研究中心，如伯明翰学院、利兹学院和谢菲尔德学院分别成为酿酒业、纺织业和钢铁业的教育和研究中心。

利物浦学院就是这批新诞生城市学院中的一所。建校之初就明确了服务城市的办学宗旨，学校章程明确规定：“确保利物浦市和附近城镇的居民能够接受人文、科学等其它学科方面的学位课程。同时针对某些专业和商业领域的需要进行具体的技术指导。”学校的校徽则以艺术形式直观地展现了大学与城市的历史渊源关系。在利物浦大学的校徽中有三只利物鸟（利物鸟是利物浦城市的象征，利物浦的几座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利物鸟）。校徽中还有一本摊开的书，上面题写着一行拉丁文，意思是：这所大学将带给这个城市智慧之光；书的周边有飘带，上面的拉丁文说：这儿的气候宜人，非常

适合学习。在办学实践中，利物浦学院借助利物浦当时海上贸易的优势资源，最先成立了海洋学专业，并着力发展航海业，设立了造船、冶金等相关专业，正如利物浦大学前副校长汤恩（John Tonne）所言：“在1880~1903年期间，当时称为利物浦学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贸易在这个城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学校开设的课程都与这个行业有关”。这样，19世纪的利物浦学院凭借这些优势学科，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航海业的教育与研究中心。

利物浦学院办学特色的形成，提升了学院在全国的影响力，为其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奠定了基础。和当时的城市学院一样，利物浦学院的最初定位是以科技教育为主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因此，建校后未能取得与传统大学同等的学位授予权。在英国，只有获得政府颁发的特许状（chater），大学才可获得学位授予权，成为真正被社会认可的大学。对城市学院来说，没有特许状和学位授予权，就无法与古典大学相抗衡，自然也难以推广其倡导的新教育理念。鉴于此，从19世纪80年代起，城市学院开始了争取特许状的大学“升格”运动，该运动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城市学院开始向古典大学的人文传统回归，逐渐增设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城市学院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已有很大进展，例如，曼彻斯特学院的历史学、伯明翰的商学在英国已小有名气。这一时期的利物浦学院也增设了音乐、英国语言与文学、历史、法学等学科专业。二是，城市学院开始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城市学院一开始就很重视科研，只是早期的科研活动大多围绕地方的具体问题，侧重于各种应用技术发明。为了与传统大学相抗衡，城市学院加强了基础学科的研究。利物浦学院在这方面可谓成果卓著，它率先成立了医学院，在这里诞生了英国大学的第一个生化系。1902年，医学院的罗斯教授因为发现疟疾扩展方式，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这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之后，利物浦大学又相继产生了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辉煌的学术成就为利物浦学院成长为研究型大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期，随着人文教育的加强，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的突出成绩，一批城市学院终于升格

为城市大学，打破了古典大学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垄断”格局，标志着英国现代大学的真正开端。利物浦城市学院于1903年获得皇家特许状，是最早升格为大学的一批城市学院之一。今天，利物浦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人文社会学科与理工学科兼备、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综合性大学，是英国著名的罗素盟校的成员之一；大学目前设置专业已达100多种，其教学质量和科研实力在全英大学排名中都名列前茅。据2012年英国泰晤士报增刊发布的大学排名榜，利物浦大学在全英排名第31位，全球第181位。同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中，利物浦大学则位居全球第101~150位之间。

三、在城市转型中寻求新发展的利物浦大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利物浦大学又敏锐地捕捉到城市发展的新元素，一方面，它从这些新元素中汲取“养分”，挖掘和开拓大学的前沿与特色学科；另一方面，它通过教学与科研服务，为新兴产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并推动城市走向更宽广的世界舞台。所以，今天的利物浦大学在整个城市发展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并深刻地改变着利物浦的城市面貌。

1. “披头士”音乐与利物浦大学的音乐产业研究。利物浦是“披头士”的故乡。20世纪60年代，以“披头士”乐队为代表的摇滚音乐在利物浦萌生，风靡全球。“披头士”乐队把全新的音乐感受带给西方一代青年，而且将这种影响深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尤其在美国，“披头士”摇滚音乐至今仍吸引着无数的追随者。从音乐专业的角度来讲，“披头士”乐队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意味着四名利物浦青年杰出的音乐创作，还象征着流行歌曲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正是意识到“披头士”音乐所代表的流行音乐的文化价值，1988年，利物浦大学成立了流行音乐研究所，并组建了流行音乐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中心日常工作的迈克·约翰斯（Mike Johns）博士说：“我当初来利物浦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来这儿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城市”。2000年，利物浦大学又设立了音乐产业管理硕士学位，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该专业领域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流行音乐从创作、演出、录制到出版发行，实行全程系统管理已

经成为一种模式，音乐产业管理课程与专业的开设顺应了这一趋势。音乐产业管理课程与硕士学位目前已经成为利物浦大学的特色和王牌，吸引了全球众多喜欢音乐创作，并对音乐的商业化操作感兴趣的学生，未来的音乐明星也许会在哪里再次诞生。

2. 城市足球文化与利物浦大学的足球MBA。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利物浦则是著名的足球城，这里拥有世人皆知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和埃弗顿足球俱乐部，每当周末人们便会到著名的安菲尔德球场观看足球比赛。正是基于利物浦这样的城市足球文化氛围，1994年，利物浦大学创立了足球研究中心，并与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共同开设了足球MBA课程。利物浦大学足球产业集团总裁洛根泰勒（Logan Taylor）博士说：“我们认为，要在体育（足球）产业方面获得成功，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所以我们就想开设一种课程，我们称之为足球MBA，让学生具有一些基本的商业管理能力，然后在足球的不同方面深入研究，比如说，国际足球事务、商业足球和足球的全球化，还有足球与金融、足球与法律”。利物浦大学足球MBA专业的课程设置非常丰富，而且经常从校外聘请业内知名人士来讲课，比如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老总、曼联的皮特·卡内姆（Peter Kanem）、英国足球协会的CEO等。如今，足球产业管理与研究已经成为利物浦大学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特色专业之一。对足球产业的开创性研究与浓郁的城市足球氛围，在利物浦城和利物浦大学实现了完美的嫁接。

3. 在利物浦城市规划中成长的城市规划系。城市规划是一门新兴学科，英国1909年才通过法规引进城市规划体制。利物浦大学在该领域一直走在前列，是英国最早设立城市设计与建筑学专业的大学。前文提到，在上世纪的城市复兴过程中，利物浦投入巨资修缮历史遗迹，改造旧城区。如何在保存历史韧性的同时，让古老的城市和现代的居民融合起来，这些都需要缜密和完善的城市规划。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系就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该系在当地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规划项目中都扮演了核心角色。以利物浦城的绳索工场街区（Rope Walks）为例，在改造以前，这里曾经是各色夜总会、酒吧和外来人口聚居的杂乱区域。更糟的是，这里的居民有近一半为居无定所的流民，犯罪率居

高不下。针对这一“罪恶街区”，利物浦大学经多次讨论研究，最终提出了市政府和居民都满意的行动方案：把它改造成一个中小企业的聚集区。于是，从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里，共计9839万英镑的资金被用于该街区的改造。街区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让该社区恢复了活力，成为了资源自给的社区，并且吸引了一大批创意产业人才在这里建立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工作室。在城市规划设计中，除了要实现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外，更要为居民的生活创造机会，以提高整个社区的生活质量。利物浦大学的城市规划系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才能在该领域“先知先觉”，并办出了特色与卓越。

4. 推进利物浦城市国际化进程的利物浦大学。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参与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已经成为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利物浦大学必然要走出利物浦，走向世界，这是利物浦大学定位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的必然趋势，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利物浦城市国际化的题中之义。开展大学间的国际合作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物浦大学特别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和教育市场潜力，正如其校长菲利普·拉伍（philip love）所言：“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炙手可热，中国需要大量优秀人才支持快速发展的经济，利物浦大学愿意与中国全力合作。”在这种国际战略的指导下，利物浦大学主动寻求与中国大学的合作，由此成为英国第一所在中国开设独立高校的大学。2006年5月，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利物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强强合作创办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简称西交利物浦大学，它是目前唯一一所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外合作大学。2010年，西交利物浦大学送出了132名首届毕业生，他们中的96%被世界著名学府录取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超过10%的毕业生收到排名世界前十位的一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些成绩为扩大利物浦大学在中国的影响，进而提升其国际声誉与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利物浦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利物浦与其在中国的友好城市——上海的交流与合作。利物浦和上海都有作为国际港口城市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利物浦因而有“英国外滩”之称，

上海被视为其在中国的“姊妹”城市。西交利物浦大学选址在毗邻上海的苏州工业园区，就有促进两座城市深度合作的考虑。最近，利物浦大学还与同济大学联手启动了一个关于浦东新区环境管理的合作项目。借鉴利物浦城市规划的丰富经验来改造上海城区，可以说是利物浦城市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提升利物浦的城市形象和传播其城市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利物浦大学与中国大学界的合作显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

四、利物浦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利物浦大学在与利物浦城市的百年互动中，呈现了一些鲜明特征和有效做法，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推动中国大学与城市之间的有效合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1. 城市的产业资源优势是大学品牌特色的重要来源。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众化进程，地方高校都抓住这一发展契机，贷款扩校、升格大学，继而忙于向综合性大学的行列迈进，而忽视了所在地区和城市的需要。结果是各地方大学纷纷走上相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千校一面”的格局，同时也导致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和教育资源的浪费。相比之下，利物浦大学始终能够立足于城市的产业特色，并结合时代的需求发展其特色学科，如19世纪利用城市航海中心的优势发展航海业，20世纪城市转型后又借助其音乐和足球文化产业资源，开创了音乐和足球管理的新兴学科。这样，利物浦大学在不断推进城市现代化的同时也树立起自己的学科特色和教育品牌。这种办学思路以异质化的办学目标避免了与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的正面竞争，但却通过特色功能的互补优势，同样为自己在英国著名大学“群落”中争得了一席之地。总之，城市资源是大学办学特色的一个重要来源，利物浦大学敏锐地捕捉城市产业优势，走差异化竞争的成功办学路线，证实了这一论点。而这样一种办学思路对于今天处于快速成长期，但却明显缺乏办学特色的中国大学而言，无疑是特别值得反思与借鉴的。

2. 立足城市的地方大学同样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主要采用中央和省级两

级行政管理，除直辖市外，城市对所在地大学一般没有直接管理权限。而大学基本都具有厅局级以上行政级别，又特别看重自己的服务层次、范围与行政级别的对等性，认为放下架子与地方城市合作，会导致学位声誉、行政地位随之“降格”，其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受限，从而失去成长为国内乃至国际一流大学的机会。而利物浦大学恰恰展示了一所地方城市学院如何不断把城市资源转化为自身成长的“钙剂”，而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从起初领先全国大学的几个优势学科，到学科健全并具有全国辐射力的综合性大学，再到凭借新兴特色学科向国际市场进军。今天的利物浦大学虽然面向世界办学，但并未打破百年来与利物浦城形成的共生关系，反而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利物浦大学的成长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区域性大学还是面向世界的一流大学，都是存在于城市之中的大学，只有在发展中顾及其“立足之地”，才可能把目光放得更远。

3. 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合作是广泛而多层次的。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兴起了建造大学园区、大学城的热潮。但是，盲目建造大学园区与大学城

的背后，也隐含了一种对大学与城市关系做简单化、功利化理解的危险，即把大学仅仅看成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忽视了两者的广泛、多层次的合作。从利物浦大学与城市互动的经验来看，城市产业与经济基础虽然是大学发展必须倚重的物质来源，但是，大学对城市的回报却绝非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功能。例如，在城市公共规划的咨询中，大学不仅着眼于挖掘社区的经济增长点，更关注社区的文化形象、公共治安和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再如，利物浦大学打造的音乐、足球管理等特色专业，打的也是城市文化这张牌，它们成为推动利物浦城市国际化的“文化名片”。总之，大学与城市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存在广泛合作，尤其是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机构，大学在城市文化塑造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担负重要职责，发挥着引领文化、辐射文化、创新文化的多层次功能。

（茹宁，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年第5期）

从历史视角探析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张臻汉 张海英 张彦通

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备受关注，新型城镇化是中国长期国策，就高等教育或城市化的专业研究层出不穷，但将二者结合的并不多。城市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集合体，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载体，是人类社会经千百年变迁延伸至今的客观现实；现代城市化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城市发展需要人才、技术和管理，也需要有潜质的消费群体。高素质人才和前沿知识源自大学，大学成为城市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大学为城市培养人才，并通过科研、文化等服务于城市。目前我国大学与城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大学生“就业难”与城市用人单位“人才荒”并存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因之一在于大学并未充分实践自身社会责任，大学与城市之间缺乏有效、良性的互动。

大学社会责任发挥的程度，影响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深度。大学职能主要是教学、科研和服务，大学的社会责任应在于培养人力资源，并以科研成果转化和文化交流等服务于社会，大学通过提高市民素质、改善文化环境、促进就业、助推和谐社会等方式，在现代城市承担深层次社会责任。正如博克（Derek Bok）所认为，大学作为特定的文化机构和准公共教育组织，对现代社会承担重要社会责任，当大学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大学应在学术功能和非学术功能范畴内对社会需求做回应、做贡献，同时也要坚持自身学术原则。日本的高等教育和城市化都属于后发赶超式发展，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对同属后发国家的我国而言，研究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值得在新型城镇化中借鉴。本文分四个历史阶段，主要以大学社会责任为脉络，从日本大学的理念、结构、改革发展等落笔，结合日本的国家社会历史背景，通过分析大学在日本城市化各阶段的作用和社会责任发挥，来探究其大学与城市互动的特征和机理。

一、战前城市化初始期的“淡泊疏离”阶段（1868—1945）

二战结束前（1868—1945），日本大学与城市

都被“国家主义”主导，二者缺乏互动，相互联系被弱化，二者关系淡泊疏离。城市化处于初始阶段，甚至因战争停滞。大学服务于国家主义，战争期间更被军国主义所裹挟，教育被纳入“战时统制”体系。日本政治处于高度集权，国家被政客、军人和财阀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所把持，政治与军事、经济相黏合，大学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力不从心，处理与城市的关系时颇为无奈，知识分子在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博弈中势单力薄，大学理想被压抑和扭曲。

战前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特点是各自独立，鲜有互动，堪称处于“冰河期”。大学与城市皆被捆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上，其资源都围绕国家主义配置，大学的使命、学科等与城市并不关联，大学社会责任难以发挥，二者都随国家政治军事形势起起落落，无法沿着大学逻辑和城市演进规律有序发展，至日本战败时，大学与城市都遭到重创而停滞甚至倒退。战前是日本城市化的史前期，城市及其人口数从1898年的52个和1439万人，到1918年上升至79个和3102万人，城市化率在1940年为37.9%，1945年战败时跌至27.9%；随着战败，大学体系也瘫痪崩溃。政治因素是其主因，作为身居岛国的后发国家，近代日本内部资源匮乏、技术落后，外部面临发达国家列强的竞争威胁，统治者选择了国家主义战略，以集中资源求得迅速发展，贯彻明治维新推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方针。

战前日本大学的使命不是服务于城市社会，而是为国家服务。森有礼1885年任文部省大臣，推行国家主义的教育改革，《帝国大学令》《教育敕语》相继颁布，体现国家主义教育思想，1890年日本天皇颁发《教育敕语》，规定教育目的是“义勇奉公”“扶翼皇运”，即效忠“皇国”；福泽谕吉认为教育要培养国家观念，教育是建设文明独立国家的根本手段。东京大学的创立目的即为国家服务，国家高等教育资源集中投到首都东京，大学为

国家，国家为大学，城市仅是国家战略的载体；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文部省将40%的教育经费拨给东京大学，以举国之力办一所大学。

从1917年的“临时教育会议”至1937年“教育审议会”，教育行政进一步集权化，日本教育体制加强了“皇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特征。决定该时期教育政策的是直属内阁的“临时教育会议”，日本政府根据其建议，于1918年12月公布了《大学令》及《高等学校令》，“大正时代后期至昭和初年的主要教育改造，均源于1917年开设的临时教育会议”。

这时期大学教师的任用受中央政府控制，与城市无关。1918年颁布的《大学令》明确，“私立大学教员录用须获文部大臣批准；公立大学教员中无法获得官吏同等待遇者亦须经相同批准手续。”在与其同期颁布的《高等学校令》中则指出：“高等学校教员须持有文部大臣授予的高等学校教员执照”。

大学学科设置服务于国家需要，与城市关联甚少。其由文部省控制，服务于重工业型的产业结构及军工。帝国大学令第一条规定“帝国大学以适应国家需要、传授学术技艺并研究其奥秘为目的”。东京帝国大学1886年成立时，设文理工医法农六科，外语被重点建设，目的是服务工业化，向西方学习，教师多来自英法等先进国家，政府付出高昂薪酬。从1890年到1920年至1940年，工业比重从13.5%增至26.5%到45.6%，农林水产业从47.1%降到32.9%至20.9%；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轻重工业比从1930年的64.5：35.5，变为1935年的47.3：52.7，1942年的27.4：72.6；军工企业规模占优，1909年日本超过5000职工的大企业14家中，包括5大军工厂，其中前3均是军工企业。大学学科在战时为军事而设，大学沦为军国主义工具；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建立战时统制，大学增设飞机、机械、医疗等军事相关学科，科研集中于武器和军事医学。

二、战后城市化复苏期的“接轨结合”阶段（1945—1955）

战后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1945—1955年的“接轨结合”、1955年—1973年的“匹配相生”及1973年后的“引领融合”。战后日本城市化历经“复苏期”“成长期”和“成熟

期”三阶段，而同期日本的大学经过“民主化”“大众化”及“自由化”三阶段，大学与城市在三个时期各具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影响二者的互动关系亦按三个阶段进行历史演变。

大学改革在战后日本得以率先进行，教育先行的理念得到日本当局和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的共识，为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城市复苏奠定了一定基础。1945年9月，《建设新日本的教育方针》由文部省颁布，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由此开启，明确指出战后日本教育改革要“废除基于服务战争的教育政策”，为“培养建设文化、道义国家为目标的文教政策”而努力。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公布，从教育目的指出“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制度应以承认人的价值与尊严为基础”，否定了日本二战前的中央集权教育体制和战时教育对人性的桎梏，强调个人发展，地方分权。这也为战后日本大学加强与城市和地方的联系提供了政策基础和理念上的契机。

战后初期（1945年—1955年），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由淡漠缺乏转入“接轨结合”，大学与城市经济接轨。城市化率从1945年的27.9%升至1955年的56%，恢复至战前水平，并有所超越，谓之城市化的复苏期。称其特征为“接轨结合”，因战后初期日本大学与城市在需求供给上有了结合点，战后的城市急于发展民用工业而向大学提出人才需求，大学则由军工转民用来迎合城市的需要，大学亦在捕捉发展机会，二者一拍即合，大学与城市的良性互动也由此开启。

复苏期城市的特点是蓄势待发，其主要需求是城市亟待启动民用经济，急需工业和管理人才，中小城市则尤显迫切；城市化处于复苏期，城市产业结构转向以第二产业为主，1950年—1953年，日本主要企业的平均利润由5%提至10%甚至35%，平均纯收入由3500万元增至2.32亿元，有的竟增至9倍。原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难以产生工业人才，城市制造业发展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缺口则寄希望由大学来填补。

复苏期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呈现“接轨”和“均衡”两大特点。一方面，大学和城市皆处在蓄力期，通过完善政治经济体制及高等教育改革，开启了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的发端，二者开始

接轨；另一方面，大学得以均衡化布局，大学的规模、水平均有提升，促进了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又激发城市活力而推进城市化的复苏，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受益。

该阶段大学与城市关系特征的主要成因在于，政治上，政治形势巨变，战后改革使日本从法西斯军国主义跨入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民主化政治体制得以确立，日本社会走向正轨，社会运行的重心转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日本新宪法于1946年颁布，主旨在于否定“皇权神授”，确立议会共和政体，放弃战争，保障国民人权；政党尚处重建或恢复期，政治体制呈多元化倾向，政治氛围趋于民主宽松。经济上，战后日本废墟遍野，经过以解散财阀、农地改革为核心的战后经济改革，重建经济是当务之急，面临产业扩张和人才短缺之间的矛盾。文化上，学术界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培养人的职能，如南原繁的《大学的重建》、上原专禄的《大学的职能》等。

大学的“民主化”利于城市社会复归正常。大学使命与城市始有交集，大学“民主化”强调培养人格健全的社会建设者，这与战前高等教育培养顺服臣民有了根本区别，其主旨在于培养精神自主的市民，促进了城市社会恢复正常秩序。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以民主理念推进对日本教育的改造。民间情报教育局、文部省、教育刷新委员会等机构酝酿教育改革政策。1947年《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相继问世，强调民主教育理念；对于《教育基本法》的地位，日本最高法院表述“教育基本法替代宪法中有关规定，在战后以教育改革为目的而制定的各项法律中居于核心地位。”1948年文部省制定《新制国立大学要纲》，展开新制大学改革。1949年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率先开学。

大学的学科、规模与城市经济接轨。226所新制大学中综合大学占43.3%，国立大学一般为综合性，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单科大学居多，文理工农医艺术体育皆有，大学学科的复合性及实用性与城市化的恢复相适应；经济结构转向民用，制造业成为城市化的原动力，高校层次结构从第一层次（专科）提升至第二层次（本科）为主，并且研究生教育发展较快，1950年本科在校生比例从1945年的

18.9%提高到90.5%；大学规模与城市化发展相适应，1955年大学本科生为513181人，是1935年的2.7倍；1955年研究生人数为10174人，是1945年的6.4倍，1935年的3.9倍。

大学布局均衡化有利于城市的普遍发展。美国占领军当局和日本政府在均衡化布局大学上既有共识，又有政策，新制大学的建立实行“一府县一大学”的原则；新制大学布局于区域中心城市及中等城市，为二三产业提供人才和技术；新制大学覆盖各区域，各府县均设立大学，38所地方国立大学如长崎、熊本、冈山、信州、鸟取等大学，服务于区域中小城市，改变了战前大学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状况；大学带动各区域中心城市的工业化，以之为龙头带动区域发展，如广岛、仙台、福冈、札幌、名古屋等地的国立综合性大学。

名古屋大学与名古屋市的互动，是大学与城市“接轨结合”互动的范例。这种互动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腾飞，也彰显了日本大学注重应用并与城市紧密联系的传统。名古屋大学创立之初就设置理学部和工学部，于1948年设置法经学部、文学部，1953年—1955年间陆续开设了理学、工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等8个研究科，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其生源超过半数来自爱知县，75%出自东海地区，为“中京工业带”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使名古屋市与丰田市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汽车工业城市圈”；大学植根于城市，促进了城市的经济文化繁荣，城市的知名度和支持又促进了大学发展。

三、城市化成长期的“匹配相生”阶段（1955—1973）

1955年—1973年间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跨入“匹配相生”阶段，大学社会责任深化。城市化进入高度成长期，城市化率从1955年的56%到1973年升至约74%，达到城市化发达水平。所谓“匹配”，是指城市化的高成长以工业化为支撑，工业化需要区域经济中产业链的上下游联动，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城市间形成专业分工，日本大学便顺势而为，与城市的分工格局匹配发展。所谓“相生”，指两种生物相邻生长时，受其所挥发的化学物质影响光合作用而相互促进生长，大学与城市间相互促进又保持各自个性的互动特征，可喻之“相

生”互动。

城市化成长期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处于腾飞期。1955年鸠山内阁经济企划厅编制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提出引进国外新技术使产业设备现代化，并根据下村治的边际进口依存度模式制定振兴贸易和扩大出口等四项重点政策，预示经济高潮来临。1960年池田内阁公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度），宣称年增长率9%，将实现10年内收入翻番，同时充分就业。世界“以惊奇的看待这一近乎癫狂的增长数字”。具体而言，就是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26兆日元（1958年是9.7兆日元）。这也反映着这时期日本的国家战略，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紧密依托。

成长期城市的核心需求是发展经济，城市作为日本实现经济腾飞的主要载体，要求大学为其经济高速增长提供相应人才；城市化以工业化为路径，工业化需要规模化、专业化的人才作为基底，并以技术为支撑，方能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大学则是技术和人才的主要来源。

大学以“大众化”来积极回应城市的需求，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其社会责任进一步发挥，大学日益走向城市社会的中心。日本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学通过迅速扩大规模提高对城市的人才供给，以合理的布局来契合城市的经济格局，城市为大学提供生源和就业机会，大学与城市互利生长，二者建立起匹配相生的良性互动关系，双赢共进而相得益彰，城市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大学在量和质上均实现跨越式提升。大学成功的标准转向能否与城市社会相适应，大学教学及科研与城市的需求相衔接，中心城市规模扩大，第二产业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城市呈现专业分工，大学的学科结构随之匹配，大学与城市契合定位，二者相互促进；日本经济由此腾飞，经济总量在1968年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其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人口比率从1959年的37.5%骤减至1971年的17.4%，12年中第二产业人口比率从26.1%增至35.5%，第三产业人口则从36.4%增至47.1%。

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转化是其成因。政治上，政府把重点全面转向经济，国际“冷战”结束，国内“五五体制”政体确立，全力推动经济，新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后，池田内阁提出政治的目的就是提

高国民生活水平；经济上高速增长，“消费革命”掀起，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文化上，大学“校园纷争”此起彼伏，经济快速增长中社会问题显现，促使大学改革，其社会责任和管理成为改革方向。

成长期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以“匹配”和“相生”为两大特点。大学的规模及结构皆与城市经济相匹配。1955年—1973年，制造业比重从30%增至36.4%，以家电为代表的电气机械产业增速为27.6%；在1957年的《新五年计划》中，预测1962年将缺8000名科技人员，故1958年到1960年实施增招理工科大学学生；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颁布后，从1961年起每年增招理工科大学学生1.6万名，以满足经济所需17万科技人员。大学入学率从1954年的10.1%增至1974年的34.7%，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层次也深化为本科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研究生院、研究院。学科结构上，工学类本科生从1960年占全部学生的15%上升到1970年的21%。大学与城市在规模结构上的匹配，使得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日本国力这一时期迅速提升，日本197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5年增长3.6倍，同期德国、美国、英国则仅为1.3倍、0.7倍和0.5倍，日本藉此短时间跃居世界经济大国前列。

大学与城市定位契合而相生相长。川崎是大学与城市“匹配相生”互动的范例。政府引导形成“多中心城市”和城市的专业分工，出台多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文部省等把关大学的设立审批，力求大学定位与城市一致。中心城市向第三产业优化，总部功能强化；中小城市按业务核城市专业发展，制造业由中心城市外迁至业务核城市。东京1958年提出第一次首都圈发展规划（National Capital Region Development Plan），1970年代规划“多极城市结构”，把核城市发展为就业和服务副中心，以缓解东京都心的压力，川崎、浦和、大宫、幕张、千葉等被列为特色产业集聚的核城市，如千葉以钢铁机械业为主。川崎在60年代发展制造业，集聚了富士通、东芝等电子、精密机械企业，川崎的大学以专修大学为特色，与当地制造业联系紧密，后来川崎借助与专修大学等的合作，向环保节能产业转型；川崎的大学积极发展应用型学科，与城市特色产业的需求相匹配，大学与城市在

务实的合作互动中相互受益而相生相长。

四、城市化成熟期的“引领融合”阶段（1973—）

1973年以后，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进入大学对城市的“引领融合”阶段。城市化水平超75%而进入成熟期，城市的社会问题复杂化，从单纯追求经济转向多元化，精神诉求开始超越物质欲望；日本的大学转入“自由化”时期，大学从社会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从以往对城市的匹配支持，转向以知识和智慧引领城市发展，大学与城市在发展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叠加，二者互动关系趋于引领与融合的特征。

成熟期城市的核心需求在于社会问题复杂化，需要大学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以解决深层次社会矛盾；其背景是日本经济目标基本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美国，人们需求多元化，人口结构“高龄少子化”，城市社会面临转型升级。

日本的大学则通过改革回应新时期城市的需求，以其“自由化”特征更贴近城市社会，注重从精神和物质层面均与城市相契合，大学与城市的互动更趋于融合。大学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而日益走向城市社会的中心，一方面大学与城市社会深度互动，趋于社区化，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科研成果转化突出适用性，更直接地服务于城市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大学作为文化传播中心，引领城市文化。城市已不局限于经济富足，更需社会和谐，大学显现其特质，有能力担当经济之外的社会责任，从精神文化等领域引领城市社会的和谐建设。

大学与城市该阶段关系的成因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的转折。政治形势转折，美国放弃了“遏制中国”政策，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经济上，石油危机使其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日本战略方针转向“技术立国”，要从模仿、追随转向独创、领先的开拓时代，产业结构向知识集约和节能转化；文化上，当经济增长达至相当水准，人们对精神生活和自身福祉的追求逐渐超越对物质的追逐；社会上，老龄少子化的人口结构使得社会问题更为复杂。

成熟期日本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显现“引领”和“融合”两大特点。

大学对城市的引领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

面。一是从精神层面，大学使命注重城市的精神生活质量，重视终身教育。1987年“大学审议会”要求大学围绕现代城市加强社会责任，大学改革围绕高度化、个性化与活性化展开。2006年《教育基本法》强调“终身学习理念”，大学致力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放送大学”，为在职人员提供学习机会，创设长期在学制度，并向社会开放资源。二是从物质层面，大学引领城市的转型升级和低碳化。1973年石油危机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立国”理念崛起，削减高耗能产业，发展节能环保，倡导循环经济和低碳社会。进入21世纪，大学纷纷设立新学科，如信息应用、身心健康、知识产权、环保等，2000年6月颁布《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2002年日本278个大学学部中环境类学部有20个，1390个学科中环境类学科占129个，京都大学、冈山大学等环保特色浓厚。2003年正式实施《国立大学法人法》，日本的国立大学推行法人化改革，大学从制度层面更加直面社会发展的挑战，大学得以拥有更多自主权，不仅创造知识价值，更在新的消费型社会背景下，加速知识和信息的流通，使得大学进一步与城市社会接轨。

筑波大学城是大学与城市引领互动的典范。筑波大学的设立是基于日本社会进入新阶段后的新设想，新构想大学的用意在于进一步发挥大学的社会责任，赋予大学新的活力，让大学以其独有的智力知识资源引领城市社会的发展。筑波大学引领筑波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名城，筑波城也以其宜居、宜学的环境支持筑波大学的发展。一方面，筑波大学从规划、科技、文化、人才、产业等各领域引领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其一，规划建设引领。筑波大学率先于筑波科学城建设，科学城的规划建设围绕大学展开；筑波大学1973年以东京教育大学为基础扩建，由东京迁至筑波，经过筑波大学十五年的前期铺垫，城市公共设施得以完善，科学中心地位强化，1987年筑波市才正式成立。其二，科技文化引领。筑波大学建立学群、学类、学系等新的教学研究组织形式，倡导以开阔的视野展开跨学科研究，筑波大学的创新文化引导着城市文化，城市学术氛围浓郁，助推筑波成长为世界科学名城。其三，人才引领。大学引领城市集聚科研机构 and 人才，筑波大学培养出3位诺贝尔奖得主，成为筑波科学城的

旗帜，筑波集聚了日本31%的研究机构、40%的研究人员和50%的国家研究机构预算。其四，产业引领。筑波大学带动筑波城的产业发展，支持产业界从“模仿者”转向“创造者”；为促进大学带动城市产业，《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1998年实施，筑波大学2002年成立产学研办公会，至2010年衍生出83家公司，以知识成果转化促进城市产业。另一方面，筑波科学城回馈和支持大学发展，一是筑波市政府有效运用《特别研究员制度》等政策，利于大学吸引人才；二是筑波城规划建设成绿色低碳的宜居城市，并提供完善的生活服务体系，有助于大学留住人才；三是筑波科学城的知名度和科研机构有利于大学凝聚生源和人才；四是筑波城为学术交流创造良好条件，筑波技术支援中心和文部省筑波交流中心等是有利于科研交流的代表性机构。

东京的大学与城市是融合互动的范例。在东京，大学与城市相辅相成，大学遍布于城市各角落，其生源、教学、研究、生活、就业等各层面，与城市深度互动。进入21世纪，这种融合互动氛围更加浓厚，自1998年—2006年，35所首都圈大学向东京市中心方向迁址。至今东京大学产生5位诺奖得主和1/3的日本学士院成员，其毕业生在政治经济产业界亦成就斐然；通过内设的产学联合本部和外设的技术转移构及天使投资基金打造产学联合“金三角”，促进知识成果转化；其“国际产学共同研究中心”与东芝、索尼、日立等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早稻田大学的校园有四处，遍布东京，至今培养了约50万学子，活跃在文体传媒政治经济科技诸领域。在大学的帮助下，如今东京占全国支票交易额的80%，股票交易额的70%，汇集80%的上市公司，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五、结论与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日本的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变迁史，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思考和统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对我国的启示主要在于：

一是大学应充分发挥社会责任促进城市全面发展。加大力度重视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大学更切合实际地进行学科规划和师资建设，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应有之意。大学的功用要与社会情境时空相吻合，大学不仅需走出象牙塔，更应主动与城

市社会加强联系，以充分实现大学的价值。大学应努力承担更全面的社会责任，促进城市的统筹发展：其一是大学应加强有的放矢地服务于城市社会，人才培养和科研与城市需求紧密衔接，大学与城市的定位相契合，大学的布局、层次及学科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相对接；其二是大学应积极发挥对城市的引领作用，促进城市的和谐社会建设，提升居民文化素质，提高市民精神生活质量；其三是深化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大学法人制度建设，加快大学去行政化的步伐，使大学的发展机制更具自主性和灵活性，促进大学与城市社会的深层次互动。

二是政府和社会应引导大学与城市互动共进。新型城镇化是国家战略，是系统工程，需社会各界的合力，新型城镇化战略要充分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作为后发国家，目前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后社会矛盾累积的释放高发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都面临挑战，新型城镇化需要高等教育与之有机匹配；城市应为大学提供需求和支撑，使大学的发展更有空间和潜力，大学则通过自身发展服务于城市。政府和社会应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大学与城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而言，其一是政策要合理把握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无论是国家、区域或城市政策，在发展布局、经济结构、城市规划、财政税收、土地环境、文化教育、人力资源等各项制度安排上，都要统筹兼顾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其二是深化政府体制机制改革，保障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系列政策的匹配性，以更透明的政策制订流程使其更具科学性，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其三是社会各方应努力建立协调机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强化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的氛围，促使大学与城市共赢共进，共同推动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张臻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张海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北京 100191；张彦通，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业务司司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191）

（原文刊载于《现代大学教育》2015年第4期）

日本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分析

——以名古屋大学与名古屋市为例

于 颖

正如学者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指出的那样，尽管有大量关于大学与社会方面的著作，但很少有人关注二者互动的一个关键点：城市。其实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为高等学府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而大学基于它自身的魅力又不断地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与学生，让大学与其所在的城市均散发出学术与青春的气息，同时也带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大学与城市，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互相依存，又相互制约。地处亚洲的日本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其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与其所在城市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大学与城市关系的历史考察

提到大学与城市，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是城市发展的产物。11世纪，欧洲的城市开始发展，而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于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建校900周年纪念庆典时发行的小册子认为，在这一年出现了独立于博洛尼亚教会学校的自由法律教学组织，这就是一所大学建立的标志。12、13世纪，城市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也纷纷融入到了城市发展的进程之中。在大学诞生的早期，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巴黎大学与巴黎城了。学者斯蒂芬·费尔奥罗（Stephen C. Ferruolo）指出：“到1140年，或许更早一些的1120年，巴黎就不仅是一个教育中心，而且是唯一的教育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法国北部和整个西欧的学生和教师。”在中世纪时期，大学一般都建在城市之中，这主要是由于城市的生产力发达、物资丰富，以及人员充足。在大学初创时期，因为没有固定的校舍，教师不得不租借教室来授课，而这些必要的条件只有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大城市才能够提供。城市的发展与富足促成了大学的诞生与发展；而大学的不断进步与活力四射反过

来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日本的城市与大学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的许多城市都是作为城下町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主要是武士生活的城市。当时，全日本约有300个藩，多数的藩士为教育对象的藩校，且教育年限不等，年限最长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学。后来，到了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户时代，出现了“昌平坂学问所”——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机构。但是，这个机构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充其量只是一个学生与教师共同探讨学问的共同体，还并不是那种欧洲意义上的大学。明治以后，拥有自治权的大学真正在日本出现。东京大学创设于1877年，它是一所以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大学，给人以“城市大学”的错觉，其实，东京大学是彻底的“为了国家之需”而设立的大学，所以，在9年之后，东京大学就改名为“帝国大学”。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在关西地区诞生，东京大学又变更为“东京帝国大学”。此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在东京这座城市中又陆续诞生了十几所大学，而这些大学慢慢地成为了东京这座城市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京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日本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经济的发展

日本高等教育专家天野郁夫教授将日本的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大学院大学、准大学院大学、修士大学（只能招收硕士和本科生的大学）、学部大学（只有本科的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旧制的帝国大学均属于研究型大学。笔者主要以名古屋大学与名古屋市之间的关系为例来尝试探讨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名古屋市是日本爱知县的县厅所在地，现为日本的第三大城市。名古屋市建市于1889年，创立之初，面积只有13.44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5.7万人。目前，名古屋市面积约为326.45平方公里，城市总人口约为220万人。名古屋市是日本中部地区

的经济中心，它与丰田市等其他城市一起形成了世界知名的“汽车工业城市圈”，即著名的“中京工业地带”。随着工业的发展，名古屋市的商业也日趋繁荣，名古屋市早已成为日本著名的商业性大都市。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等知名学府均坐落于此。名古屋大学在名古屋市、爱知县乃至东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东海地区，尤其是名古屋市，历来被经济界看作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名古屋市的市民从业情况如何呢？名古屋市2008年7月15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最多，为786,408人，在从业的总人数中约占72.5%；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最少，只有3,491人，仅占从业总人数的0.3%，另有25%的人从事第二产业。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的恢复期、高速增长期、稳定发展期、经济低迷期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调整，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即1955~1973年这一段时间，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来说，1955~1970年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41.3%降至19.7%，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从24.9%升至35.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33.8%升至45.0%。从业人员从第一产业流向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人员流动的手段之一，毫无疑问是教育和培训。而研究型大学乃至大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创立于1939年的名古屋大学，在其创设之初并没有开设文科类的学部，所开设的理学部和工学部是应当当地经济与产业界的强烈要求而独立设置的。1940年，名古屋大学开设理工学部；1942年，理工学部分离为理学部和工学部；1945年，根据师范教育令，设立了官立冈崎高等师范学校。可见，名古屋大学在设立之初并不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二战”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复兴，名古屋大学于1948年设置了法经学部、文学部，名古屋大学发展成为文理兼备的综合性较强的研究型大学。1949年，随着学制改革，增设了教育学部。在此基础上，1920年设置的官立旧制名古屋高等商业学校中的法经学部等也都在教育政策的影响之下纷纷并入名古屋大学。在1953~1955年间，名古屋大学陆续开设了理学、工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等8个研究科。此后，为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名古

屋大学在学科及科研院所的设置上进行了及时调整，1989年，等离子研究所改组为核融合科学研究所，后转为大学共同利用机构。1991年，名古屋大学又设置了国际开发研究科。

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科技进步中，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应产业界的迫切需求，于1962年陆续设立了高等专门学校，例如丰田高等专门学校，它为名古屋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为东海地区的企业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但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大量的基础研究，还是在研究型大学中得以开展的。1990年，以理工科研究见长的名古屋大学率先在旧制帝国大学中设立与企业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其研究室、研究器材可以与企业共同使用，从而积极地推进了产学合作。名古屋大学的野依良治教授也正是在积极开展的产学合作研究的氛围中，收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正是名古屋大学等研究型大学为“中京工业地带”的形成和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为企业的创新和研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为研究型大学走向国际创造了机会与条件。随着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名古屋市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断提高。独具特色且面向尖端产业技术的“造物”文化，名古屋城、德川园等保留着的浓厚历史气息的近代武士家文化，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历史名人皆出身于此的历史渊源，等等，使得名古屋市的城市魅力在国际舞台上得以彰显。随着名古屋市知名度的提高，名古屋市各所大学的国际交流事业也逐渐得以繁荣。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进入名古屋大学及其他研究型大学深造，各种有着国际知名教授参与的国际性会议也纷纷在此召开，这些都加速了名古屋大学这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进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纷至沓来的留学生们又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无限的商机，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在互动发展中实现了双赢。

三、日本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环境的创设

大学与城市环境的创设、良好氛围的营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研究型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莘莘学子蓬勃的朝气，在良好城市环境的营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象牙塔中的学子们仿佛是四月盛开的樱花，是日本城市永远的

亮色，他们装点着城市，是城市魅力的源泉，不断吸引着来自国内外关注的目光。

名古屋市作为日本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一直非常重视环保工作。在垃圾处理方面，名古屋市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5年，其垃圾总量与1998年度的总量相比，减少了约30%，资源回收量增加了约2.6倍。在环境教育中，研究型大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名古屋市，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学习到环境知识，可以一起讨论，并将行动付诸于环境事业之中，特开设了“名古屋环境大学”。该活动定期组织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相关专家进行保护环境的相关讲座，该活动旨在提高普通市民的环保意识，让市民学到更多与环境相关的知识，该活动每年在市内举办500场以上的讲座，每年约有1万多市民参加此项活动。在与市民的互动活动中，研究型大学也充分发挥了“服务社会”这一职能，让更多市民了解大学，增加对大学的亲近感。

名古屋大学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其明显的地区性特点。从名古屋大学的生源来看，出身于爱知县的高中生超过了半数，在校学生总人数的75%来自于东海地区，也可以说，名古屋大学为东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种情形的形成最主要是由于名古屋的地理位置，名古屋位于日本最大的两座城市——东京与京都之间，也许正

是这特殊的位置影响了学生的来源。

在人文环境的营造方面，名古屋大学也是不遗余力的。例如，在博物馆定期举办各种展览、定期举办各种公益讲座，免费对市民开放；与市内的美术馆、青年会馆合作，定期举办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每年的名大祭（校园文化节）展示校园文化等。大学通过各种活动来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市民通过参加各种文化体验活动，提高了文化素质。

日本的大学与城市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是大学诞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大学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研究型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又略显不同，在拥有以上因素的同时，它又兼具文化整合的使命。城市人文环境的营造、市民人文素质的形成、城市文化底蕴的积淀都与研究型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探讨日本研究型大学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仅是一个开始。

（于颖，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教育学博士，北京100875）

（原文刊载于《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